

罗曼·罗兰

作家的生平

外省的童年

法国中部的尼埃弗省有一个古朴的市镇名叫克拉木西，离巴黎东南大约二百公里，地处丘陵地带，以林业和畜牧业为主。这个小镇，有尼淮内运河的水穿过，镇上有一座相当宽敞的砌砖石的院落，当中有一块花圃，三面是三道围墙，另一面是街道，中间隔着一道运河。这座旧式庭院的主人埃密尔·罗兰的妻子于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下了一个红扑扑的健康的孩子，他就是后来名扬世界的著名作家罗曼·埃德美·保尔·埃密尔·罗兰（简称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他性情开朗，乐观知足，年老了还经常爬山，因此活到九十五岁。罗兰一家人身体都很健康，只因一次偶然的疏忽，罗曼·罗兰几乎在寒风中冻死，结果患了终身难以治愈的支气管炎和哮喘病。罗兰一家在镇上颇有声望。祖先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热情的战士，连续五代都是公证人。母亲玛丽·古洛是一个笃信宗教、喜爱音乐而感情细腻的女子。她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她的儿子罗曼和女儿玛特兰的身上。罗曼·罗兰五岁时，家中发生了一件使罗兰终身难忘的悲剧事件。

罗兰和他的妹妹玛特兰被母亲带到法国波尔多省著名的海滨浴场去玩。罗兰非常喜爱他那聪明懂事，只有三岁的小妹妹，她有一张可爱的大圆脸，淡蓝色的眼睛，秀美的长长的金色头发。一天，他们一同在海滨的沙滩上玩耍，傍晚，他们回到旅舍房间，罗兰的妹妹患了重病只经过六个小时的痛苦挣扎便被白喉这病魔夺走了生命。玛特兰妹妹的死使罗兰的母亲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也在罗兰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悲伤的回忆。

罗兰是一个神经过敏，富于梦幻般遐想的孩子。他时常从开着的窗户望着浑浊、深绿、没有一丝涟漪的运河出神，他的思绪追随着纤夫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远去；有时他仰望着天空的浮云出神，清脆的鸟鸣，急骤的暴雨，以及圣玛丹寺洪亮的钟声都会牵动他的思绪恣意狂奔。母亲发现罗兰那敏感而好思索的天性，决意从音乐的途径开发儿子的智力，她把着儿子的小手指，教他弹钢琴，让他在音响的境界里体会到优美的感觉世界。音乐对于他，是一切语言中的语言。当这个小学生学着法兰西古代作家的浅易音乐时，德国的音乐也同时在激动他那少年的灵魂。罗曼·罗兰的家里有许多德国的音乐书，罗兰当时还没有见过一个德国人，但那些书上的音符在钢琴上形成的音乐之泉却在罗兰幼小的心灵上涓涓地流淌。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痛苦和幸福，欲望和幻想与罗兰声息相通，当罗兰在病中甚至离死不远的时候，莫扎特的悦耳的乐声像情人一般来到枕畔相伴。在犹疑和沮丧的关头，贝多芬的音乐曾燃起罗兰永生的火焰。只要罗兰是在精神衰弱或生病的时候，他就坐在钢琴前面，沉浸于音乐之中。音乐滋润着罗兰幼小的心田，陶冶了罗兰的个性。但罗兰的母亲决不愿意他成为职业的艺术家的，可罗兰暗中决定终身从事文艺工作。

罗曼·罗兰对文艺的爱好和兴趣，与贝多芬、莫扎特的乐曲有关，也和莎士比亚的著作相连。

罗曼·罗兰的家中顶楼上有一本封面精美的莎士比亚译本，罗兰在旧书堆中找出以后细心地阅读了起来，他简直被书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和奇特的

人物迷住了。罗兰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用心读着，除了楼下响着的马蹄声和门前运河上驶过的船舶的铁链声之外，他什么也听不到。他捧着莎士比亚的书坐在大圈椅中忘掉了一切，只有一群无形的看客环绕他，有许多想象中的人物在他面前出入，他和外面的现实世界隔离了。

伟大的生涯是从伟大的幻境开始的。罗曼·罗兰的热情被莎士比亚和贝多芬唤起。狭小的范围再也关闭不住罗兰的童心，简陋的小学校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这个心高志大的小孩子了。罗曼·罗兰的父母又舍不得让孱弱多病的孩子独自出外求学，于是全家决定离开恬静的故乡，迁往喧嚣的首都巴黎。

喧嚣的巴黎

一八八一年十月，埃密尔·罗兰全家五口（包括外祖父在内）告别故乡，迁居巴黎，住到多农路上一家公寓里二楼上。罗兰一家在巴黎没有有权势的亲友可以投靠，埃密尔·罗兰费了好大的劲才在一家银行谋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收入是很有限的。父母送罗曼·罗兰进了著名的圣路易中学。法国近代许多有识之士，其中不少人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罗兰在那里攻读数理方面的课程，以便为投考高等工业学校作准备。一八八二年夏天，罗兰已经十六岁，他和妹妹在母亲的带领下作了一次短短的旅行。他们从法国东南部边境到达瑞士西南部日内瓦湖滨小城。罗兰极目望去，广阔的地平线，一望无际的长空，欢乐的大地上密布了果园和农田，逶迤而下，伸向蓝色湖水的岸边，宏伟的阿尔卑斯山峦际威武雄壮的武士驻守在天边，这一切使罗兰感到大自然的神力无限。不久（1883年），罗兰转学到伏尔泰曾就读过的路易大帝中学，入哲学班，准备投考高师文科。

罗兰在中学结识的第一个朋友保罗·克罗特尔是个理想主义者，二十年后差不多名震全欧，但他后来倒向了天主教的神秘主义，而罗兰则始终向往的是自由的欧罗巴。不过当时他们两人以少年人特有的热情，长谈不倦，可谓心性相投。

巴黎是一个穷奢极欲的世界，罗兰对它的喧嚣而野蛮的物质文明产生了反感和憎恶。罗兰在日记中写道：“当我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童，从外省来到巴黎，当我开始嗅到向我稍微打开大门的世界——知识界、政界和社交界时，我内心充满厌恶而且觉得毛骨悚然。我到处看到冷酷的自私、贪婪、说谎和残暴。于是我害怕。我像一个弱小的动物。我默然了。”

罗曼·罗兰习惯了外省生活的宁静，对故乡怀有依恋不舍之情。巴黎拉丁区的喧闹，街道上闷热的空气，拥挤的人群，这一切使罗兰感到烦闷。他喘息着，呻吟着，他渴望着高于现实的美善境界，于是“光荣的艺术，在那许多灰色的时间内”又成了他的救世主了。星期日的下午，他常常去听演奏会。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乐曲令他身心陶醉、震悸。罗曼·罗兰具有音乐家的天赋，音乐对于他像信仰一样是精神避难所，每当他被音乐领入感觉世界时，他总是感到无穷的快乐。

罗曼·罗兰既爱好音乐，又喜欢读书。有一次他在巴黎奥德翁剧院的走廊下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斯宾诺沙的书，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罗兰读书

的兴趣很广，他读历史、哲学，也读地理、文学。他在中学阶段熟读了莎士比亚全集，莎士比亚的剧中人物时刻浮现在他的眼前。罗兰说：“他像战胜者似地占有了我；我像一朵花一样地挪给了他。”罗兰崇拜莎士比亚，也喜爱雨果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中学生活即将结束时，他阅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他发现了活的莎士比亚。他把托尔斯泰比作划破欧洲长空的意外发现的闪电，“这位征服者使我俯首帖耳，让他架走；使我在热爱与兴奋的激情中，气都喘不过来。”罗兰学习用功，再加上先天性的体质柔弱，尽管父亲收入有限，每年暑假到来时，父母还是要想尽办法筹集一笔旅费让身体孱弱的罗兰到瑞士去住几十天，去享受阿尔卑斯山区的清新的空气，幽静的丛林和开阔的草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恢复他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所耗去的健康和活力。

由于家庭经济拮据，罗兰中学毕业之后只能报考高等师范学校。他说：“我必须考上高师，才可以保证我有饭吃。考取之后就能得到三年的食宿费用。”罗兰两次参加高师考试都落选了，他对于令人团恼的考试制度曾产生过极为强烈的憎恨。他说他是为了要补偿亲人为他所作的忘我牺牲，才不得不勉为其难的。为了考上高师，罗兰不得不暂时放下与考试无关的书籍，把自己钉在书桌上，强迫自己终日伏案，读书写文章。终于在一八八六年二十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高等师范学校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法国人才辈出的一所师范大学，该校以严峻的校规和勤苦的校风著称。那里的教授都是知名的学者，学生三年毕业之后在学术界、教育界和文学界素来受到尊重。罗兰入的史学系，选修的主要课程是历史和地理。他是想在熟悉历史、积累材料的基础上准备日后写出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

在高师的三年学习生活中，罗兰读了大量的书籍，阅读了文学、史学和哲学方面名家的著作。当时唯灵论的哲学盛行。而罗兰则特别崇拜斯宾诺沙和笛卡尔的哲学。斯宾诺沙认为“自然界是自身的原因，自然界是万物存在的原因，是万物实质的原因。”斯宾诺沙与唯灵论对立。他否认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在斯宾诺沙和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影响下，罗兰由有神论转向自然神论。在存在和认识的关系问题上，罗兰受笛卡尔影响。笛卡尔对于整个世界存在的结论是：“我思，故我在。”罗兰说：“我感觉，所以他是存在的。”

斯宾诺沙和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不仅影响到罗兰的宗教观，还影响了他的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罗兰在高师二年级拟定了一个宏伟的写作计划，他的座右铭是：“不创作，毋宁死。”当时法国文坛流行自然主义。而象征主义、颓废主义文学也已大量出现。罗兰不满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这时他读到了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从这本书中受到了托尔斯泰艺术观的启发。但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否定了近代艺术，对一向为罗兰所尊崇的莎士比

进论》等。

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定居荷兰，在瑞典讲学，反对经院哲学，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于人类。

亚给予了轻蔑的评价，托尔斯泰对罗兰所爱好的音乐，指责为“引导人们忽视职务的娱乐品”，并且对贝多芬也痛加诋毁。托尔斯泰的这些奇怪见解，使罗曼·罗兰大为不解。于是，一八八七年四月，这位不知名的青年罗兰写信给列夫·托尔斯泰，请教他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提到关于人生的意义和艺术的目的等问题。同年九月，罗兰又从克拉木西老家写信给托尔斯泰，前后共写七封信。这位誉满欧洲文坛的名将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把二十八页的法文复信，寄到巴黎米希莱路十三号，热情地回答了罗曼·罗兰提出的问题，并且称罗曼·罗兰为兄弟。信中涉及的关于艺术问题，托尔斯泰说：“只有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艺术，这是惟一有价值的艺术。有价值的艺术家是不惜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的，先决的条件，不是对艺术的爱，而是对人类的爱。只有充满着这种爱的人，才适宜于做艺术家所值得做的事情。”信上还说：“人们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最自由最快乐的心境，莫过于爱别人和为别人献身。”托尔斯泰强调人类大团结的重要。他指出：“一切使人团结的是善与美，一切使人分裂的是恶与丑。”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对罗兰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罗兰决心通过艺术实践为人民造福；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对罗兰也产生了不良影响。罗兰后来提到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时说：“在美学上很深，在精神上很大”。罗兰对托尔斯泰的哲学观是怀疑的。他说托尔斯泰的哲学是“软弱而带惰性的哲学”。罗兰对托尔斯泰有关音乐，有关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观点是不同意的，但终身都尊崇他，敬佩他。罗兰把托尔斯泰当作他心目中的第三块丰碑（前两人是贝多芬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关于艺术应为人生服务，应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和亲密团结等教诲，罗兰是奉行不悖的。罗兰赞赏托尔斯泰将真理与仁爱结合在一起的现实主义，认为它不同于福楼拜和左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莫泊桑的悲观利己主义，它是十九世纪以来任何作家也无法相比的。

罗曼·罗兰高度赞赏托尔斯泰以泛爱为其特征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一八八七年，罗兰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宁，德法两国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新的战争的形势下思考了人生的意义。在《我相信，因为这是真理》一文里提出了“爱，是一切的基础”，认为人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人类的热爱，是人生的最高理想。他强调首先爱己，然后推己及人。他认为对于自己的爱是健康的，它是为存在而存在的伟大的爱的一部分。他反对人们用“利己”一词诽谤它。他说：“没有种种利己主义，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虚无、静止、死亡，利己主义是世界的马达。而上帝，就是伟大的利己主义者。在上帝身上，对自己的爱就是对别人的爱。”他把“爱”看作一切的基础，而“爱”又是以利己作基础的基础，他肯定利己主义，目的是推崇抽象的人类爱。也就是人必自爱，推己及人，兼爱万众。罗兰的这种以爱己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显然不同于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但它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以惟利是图为其特征的极端利己主义却又有明显的不同。

罗兰在高师曾经制定过一个十年规划。他计划高师毕业之后，先教七年书，在这期间着手写一部现实主义的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的历史小说，这部小说要像《战争与和平》那样以历史事实为背景，面对现实提出问题，探讨问题。他计划三十岁之后，写出这样一部施展自己才能的小说。事实上计划中的那部“历史巨著”始终没有写成，而真正成功的小说也是在三十岁以后写出来的。不过，从十年规划中，可以看出罗曼·罗兰的远大抱负。

留学罗马

高师的学校生活很快结束了，罗曼·罗兰通过了中学教师就业考试。从此，他可以在教育界获得中学教师的职位，终生不愁衣食无着了。正当罗兰做好准备打算开始过粉笔生涯的时候，学校将一名考古研究生的空额给了罗曼·罗兰。高等师范每年都要选派一些最优秀的学生到国外去留学，期限二年，学古代文物的被派到希腊，学历史的被派往罗马。高师校长推荐罗兰去意大利的罗马，罗兰的研究专题是莫诺教授指定的。他要罗曼·罗兰通过红衣主教沙尔维亚谛的事迹研究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和罗马教廷的关系。莫诺以为这个题目可以发挥罗曼·罗兰研究人物心理、描绘灵魂姿态的特长。罗兰对这个研究题目实际不感兴趣。他以为罗马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世界，并不是活的人生。他一到罗马就想赶快完成这项任务。他天天跑梵蒂冈的档案馆，在幽暗的保藏室搜集了有关的证据，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写出了以《教皇的随员沙尔维亚谛》和《罗马大杀记》为题目的两篇论文。剩下的一年多时间，罗兰饱览了意大利的优美风光。

风和日丽的罗马的春天，使年轻的罗兰感到身心舒畅，他忘记了托尔斯泰对于人生的严峻的呼号，而使他更多地记起的是莎士比亚对人生的赞美与洋溢的热情。罗马，给了罗曼·罗兰第一次的友谊、温暖与爱情的陶醉。

考古学校设在罗马的华耐斯宫中，那座古老的建筑物是侨居罗马的法国人聚会的地方。校长纪复华每逢宴会必邀罗兰出席。因为罗兰弹得一手好钢琴，他的演奏经常使在座的人们倾倒。在赞赏罗兰出色的音乐才能的人群中，有一位经常端坐在文人艺士中的老妇人，她名叫玛尔维达·封·梅琛葆。她是莫诺夫人的养母，是一位白发苍苍年过花甲的老人，而罗兰那时只有二十三岁。梅琛葆以理想主义的火炬照亮了罗兰前进的道路。罗兰初创剧本遭到了失败，甚至连罗兰的妻子——一个羡慕虚荣的女人和罗兰都离婚了，但梅琛葆却热情地支持和鼓励他。

罗曼·罗兰在罗马居住的时期几乎每天晚餐后都去拜访梅琛葆。在梅琛葆的家里，罗兰认识了两位意大利姑娘。她们是姊妹俩，一个是黑头发，一个是金黄色的头发。两姊妹尽管对罗兰存着珍贵的友谊，但始终不给他以爱情的幻想。

罗兰为此曾经有过年轻人的苦恼。罗兰曾将自己在爱情方面的体验写成短篇小说《罗马的春天》珍藏起来。罗兰后来还将他同两姊妹中一个名叫索菲亚的姑娘的来信在书信出版了，书名叫《亲爱的索菲亚》。

罗曼·罗兰经常在罗马的藏书室、博物馆和文人相聚的沙龙里活动，也有时到郊外欣赏意大利的绮丽风光，考查南欧的风土人情。他的面前展开了一幅“意大利十分穷苦，乡村闹饥荒，名门大族都破落了”的现实生活的画卷。但他这时一心要作大人物，要写大人物，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一九〇三年三月，罗兰在郊外散步时产生了创作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强烈欲望，这部作品在罗兰心中已开始构思了。

在意大利的两年自由生活很快地过去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召他回去做教员。于是罗兰和他称之为“第二个母亲”的玛尔维达·封·梅琛葆告别了，也告别了使他留连忘返的罗马。从这以后，他再没回到罗马。但他同梅琛葆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直到一九〇三年梅琛葆离开人世。

“不创作，毋宁死”

罗曼·罗兰于一八九一年从罗马回到巴黎在高师任教，他发表了博士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和副论文《十六世纪意大利绘画衰落之原因》之后，作了音乐史教授。一九一三年以后在巴黎大学任教，他以清脆爽朗，引人入胜，唤起共鸣的讲演使他的学生们经久不忘，他那一本本厚厚的讲义如《过去的音乐家》、《亨德尔》、《歌剧史》、《现代音乐家》等使年纪轻轻的罗兰在师生中享有普遍的声誉。

在做教师的经历中，罗曼·罗兰懂得了不少人情世故。过去，他是从研究室的窗洞里看人生，现在，社会的大门向他敞开了。特别是在他的岳父，有名的语言学家弥昔尔·勃来亚尔的家里认识了许多学术界明星和社会名流。罗兰仔细地观察他们，为日后创作积累生活素材。

罗曼·罗兰远在高师念书阶段，就有了如饥似渴的创作愿望，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不创作，毋宁死”的誓言。而他真正的创作生涯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当时，由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丛生，反映在文艺上就是唯美主义风行。罗兰这时已有三十岁了，曾喧嚣文坛的雨果、福楼拜已离开人世，左拉、莫泊桑只塑造腐败、衰弱的形象，罗兰要创作英雄人物的热情始终在他心中激荡。

一八九四年，正当罗兰满怀信心开始投入创作生活的时候，法国陆军当局诬陷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犯了叛国罪，于是很快掀起了全国性的舆论大波。德雷福斯事件把法兰西分成了两半；宣称他有罪的是一派；宣称他无罪的又是一派。不同的观点把许多家庭和团体毫无怜恤地切成两半，父与子，兄与弟，朋友与朋友都互相为敌。罗兰纵身跃入这舆论洪峰。为这件事，左拉被缺席宣判为叛国罪，在政府与正义中间罗兰作了一个正直人应有的选择。为给德雷福斯事件增添正面舆论，罗兰用圣·公平的化名发表了一个寓意剧《群狼》。这段时间，罗兰写了一组以“信仰悲剧”为总题名的剧本，有《圣路易》、《阿爱尔特》和《理智的胜利》等。这以后在社会政治斗争的推动下，又写了几个革命戏剧：如《丹东》、《七月十四日》等。罗兰的剧本演出和发表的机会很少，虽有个别剧本上演，社会反响也比较冷淡。罗兰的妻子克洛蒂尔特本来是抱着丈夫能成名的幻想嫁给罗兰的，一见罗兰文学上非但没有成名，还固执地表示要继续搞创作。为此，两人感情不合，终于在一九一一年正式离婚了。罗曼·罗兰离开了克洛蒂尔特，也就离开了巴黎的上流社会，他从烦扰的上流社会圈子中走了出来，重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到异常轻松。三十五岁的罗兰，带着他大量的书籍和不多的一点行李独自一人搬到巴黎市中心五层楼上的两个小房间里居住。

屋子里摆满了书籍，沿着墙壁全是一堆堆摞在一起的图书。窗沿、桌椅、床上到处都是书。房屋的墙壁上有朋友的照片和几件雕刻做装饰，室内有一个贝多芬的半身雕像。靠近窗户是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只小火炉。这狭窄的房间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没有一件东西能使人感到安逸、舒适和富足，没有一件东西能使人联想到房主人有什么社交活动，它完全是一个读

德雷福斯事件即一八九四年法国的法西斯应革命集团诬陷犹太军官德雷福斯里通外国而引起舆论界正义人士反对的政治事件。

书人刻苦自勉的学习室，是一个脑力劳动者劳动的车间。罗曼·罗兰夜以继日地伏在桌子上读书写作。他穿着简朴。他的个子瘦而高，面色微黄，额上和脸上满是皱纹，一见就知道他是一个常常缺乏足够睡眠的脑力工作者。他的身体比较单薄，一双纤细的小手，头发已经开始变白了，稀疏的胡须垂在薄薄的两唇上，他那专注的神情，稳健的姿态，舒缓的举动和寡言少语的习惯，无不显示出他思想隽永和气度温和。

身居斗室中的罗曼·罗兰几年时间写出了历史、哲学、诗歌、音乐、小说、评论、书札、笔记等几十万字的著作。罗兰把前几年在《剧艺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汇集成戏剧论文集《人民戏剧》出版。罗兰构思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同时，写了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画家《米勒传》、德国伟大作曲家《贝多芬传》、意大利杰出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传》、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托尔斯泰传》、音乐家《亨德尔传》、德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传》和印度思想家《甘地传》等几位英雄伟人传。他还曾打算写果什（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加利波的（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英雄）、潘恩（十九世纪初英国政治家）、歌德（德国大诗人）、席勒（十九世纪德国著名戏剧家）、马志尼（意大利著名的爱国者）和莎士比亚（英国著名戏剧家）等杰出的艺术家和政治家的传记。罗兰想要把这些忠于自己信仰的伟大人物的坚强意志和他们同庸俗的现实，腐朽的艺术以及个人的厄运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传诸后世，以便“为可怜的人类，为未来的人类有所作为，给人类做点有益的事，给他们恢复勇气，摇醒他们的沉睡，鞭笞他们的卑怯。”罗兰主张通过艺术使道德净化，用道德使自我完善起来的方式以挽救社会。

罗曼·罗兰在闭门谢客的艰苦创作过程中，他几乎哪儿也不去，连他住处附近的著名的卢森堡公园也难得涉足。他惟一的消遣就是端坐在他的钢琴旁边弹奏他所喜爱的音乐大师们的乐曲。罗兰日复一日专心致志地工作着。白天马路上的喧嚣声音像远海的涛声传入罗兰的耳鼓，有时还夹杂着一辆笨重的货车发出的刺耳鸣叫，但罗兰似乎听而不闻。只有当春天来到的时候，附近花园里的阵阵花香从窗户飘溢进来，罗兰才放下手中紧握的笔走到窗前深深地呼吸一两口新鲜空气，接着又继续埋头写了起来。这五楼上没有一户邻居，没有任何声音来干扰他，惟一的一个同伴就是专事看管房屋的年迈的老妇人，她不时来替罗兰处理一些杂务事。

一九一三年罗曼·罗兰出版了《贝多芬传》以后，在法国开始扬名了，他拥有了最初的一小群崇拜者。当《约翰·克利斯朵夫》前两卷《破晓》和《清晨》发表之后，罗兰的声望高了，国外也有了译文，有位瑞士作家为罗曼·罗兰写了传。还没等到《约翰·克利斯朵夫》出齐十卷，罗兰已拥有为之倾倒的众多读者了。接着，罗兰的盛誉像洪水似地澎湃全世界，欧洲的青年们发出了惊异的喊声，他们的心被罗兰的理想主义之光照亮了。

罗曼·罗兰写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一卷，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处在即将爆发的时刻，罗兰抓紧时间写了《哥拉·布勒尼翁》，这是一部风格轻松活泼，笔调幽默风趣的中篇小说。在这以前，罗兰一面在大学任教，一面写作。这以后，罗兰不再任教，成了专业作家了。

定居日内瓦莱芒湖畔

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罗曼·罗兰在瑞士日内瓦的莱芒湖畔维卫小镇的旅馆里沉思。白天，他在火车站的布告牌上看到了欧战爆发的消息。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激烈争夺，再加上奥国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死，一时间，战争风云弥漫全世界。奥国进攻塞尔维亚，德国向俄国宣战，继而又向法国宣战，日本乘机抢占德国侵华的桥头堡——青岛而对德宣战。罗兰眼见战火延烧的残酷现实，忧心如焚，他痛切地感到“寄托在人类博爱上的最神圣的希望破灭”，他渴望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拯救人类，他痛惜“人类精神导师”托尔斯泰在战前（一九一一年冬）已经去世。罗兰在《战时日记》中写道：“我发现自己孤立无偶，被排斥在血腥的团体之外。惟有我一个人拒绝宰割人之子的团体。就像过去在‘德雷福斯’事件时一样，我觉得又一次和别人隔离开来。”罗兰大声疾呼“反对仇恨”，但无济于事，战火以惊人的速度向世界各地蔓延。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不久，罗兰从日内瓦莱芒湖畔维卫镇迁居到维尔纳芙小镇的拜伦旅馆，一直到战争结束。罗兰在反战情绪支配下，参加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成立的“战俘通讯处”的工作。战俘通讯处的作用是将战俘的大批信件转给各自的亲属，同时设法把亲属的来信交到战俘的手中。从战俘们来往的信件中，可以了解到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多么深重！罗曼·罗兰在大战中不断写文章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他发表《致霍普特曼的公开信》，呼吁德国知识界起来制止战争贩子的军国主义罪行。他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反战论文《超乎混战之上》，猛烈抨击帝国主义交战双方的战争行为，揭发他们互相混战的血腥罪行，主张个人超脱于战争、党派和政治之上。罗兰当时没认识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认为西方各民族之间没有非打仗不可的理由，尤其错误的是，提出如果非打不可，也应当到西方以外的地区去打。当时的罗曼·罗兰还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者。《超乎混战之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遭到四面八方极为强烈的反对。法国人骂他是卖国贼，德国特务，称他作“日曼·罗兰”，说他是日耳曼人，有人提出要绞死他。而德国人则把他看成是最阴险的敌人，说他在和平外衣下的沙文主义者。在舆论狂澜的压力下，一些朋友同罗兰疏远了。罗兰感到孤立，郁闷，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久他又发表了一篇比《超乎混战之上》的观点更为鲜明的《论偶像》。这篇文章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祖国”、“民主”、“宗教”、“文明”、“文化”等骗人偶像的实质。罗兰这时的反战思想仅限于抽象的“人道”和“自由”的概念。罗兰对帝国主义战争产生的根源缺乏唯物主义的分析，更不清楚消除帝国主义战争的正确途径。眼见战火年复一年地燃烧下去，谁也不知道这场灾难怎样了结。罗兰的精神和健康都受到严重威胁。他在日记上写道：“极大的痛苦时期，感情和思想上，数不清的大痛苦。我缺少一切。一切对我不忠，男人、女人，……无名的苦难！使我受压抑的，不是他们的险恶，而是他们的平庸……这些日子，我在跟别人谈话时，散步时，或者形单影只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时，眼泪随时夺眶而出。”有的朋友劝他不要再发表反战文章，不如重返艺术园地去培育他的“文艺之花”。罗兰的回答是：“即使我明知自己的言论招致无济于事的危险，我仍然应当发言。”然而，罗兰曾一度找不到发表文章的园地。

罗兰是孤立了，但是不孤独。从全世界看，他失去了原有的一些朋友，可又获得了不少新的朋友。这其中有柏林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有俄国革命党人卢那察尔斯基，有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普通工人群众。法国记者布里瓦说：“罗曼·罗兰的言论在巴黎平民阶层获得充满同情的反应。”罗兰从这些新朋友中得到了鼓励，在他孤立无助时，劳苦大众向他伸来了热情援助之手，罗兰对此深受感动。

诺贝尔文学奖

罗曼·罗兰由于发表了《超乎混战之上》这篇政治论文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正当他为此而苦闷、孤独、沉默的时候，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翻译《超乎混战之上》的瑞典女作家爱仑凯写信给罗曼·罗兰。信上说：“上星期，维农·李提出建议，给你诺贝尔奖金，因为你是惟一超乎混战之上的人。”瑞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中立国，他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提议把诺贝尔奖发给罗曼·罗兰是可以理解的。这年秋天，巴黎传出法国作家法朗士推荐罗曼·罗兰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不久，报纸登载，奖金主持者瑞典学院准备把一九一五年度的诺贝尔奖发给罗兰，但遭到法国政府的反对。法国表示，如果瑞典将诺贝尔奖发给罗曼·罗兰，法国驻瑞典大使将拒绝参加授奖仪式。法国政府的态度使瑞典政府迟迟不发表获得一九一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名。直到一九一六年日内瓦的反战刊物《明日》的主编吉尔波用电话通知罗兰，说瑞典已经正式宣布罗曼·罗兰为一九一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接着瑞典学院和瑞典外交部打电报正式通知他，说明补发去年度的奖金给他。当年度的获奖者是瑞典作家维内·封·海登斯丹。

通知下达之后半年多，瑞典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初才将诺贝尔奖金的证书和款项寄给住在日内瓦湖畔的罗曼·罗兰。授奖证书上明确地记载着：这个荣誉是给予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罗曼·罗兰始终坚持他的人道主义信念。他的具体信念就是对统治阶级的鄙视；对一切受苦的人们的友爱；对将来的人类大团结的信念。

罗曼·罗兰在接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正式通知时的思想状况与两年前他发表政论文章《超乎混战之上》时的思想状况，已有所不同了。他原来主张，首先法国要在精神上、文化上超越其他欧洲国家，后来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有了改变。他说：“一切受苦的人就是我的祖国，一切使别人受苦的人就是我的仇敌。”可见罗曼·罗兰对祖国一词已有了新的概念。他原来主张欧洲人不打欧洲人，后来对这种“欧洲中心”的观点也作了纠正。他说：“我不喜欢‘欧洲人’这个称号了，欧洲已经充分表现出它的自暴自弃。别再管我叫‘欧洲人’！”罗兰这个阶段的思想是前进了，超阶级、超党派的态度在逐渐地发生变化。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写了《致受屠杀的各族人民》，从中看出反战思想开始有了新的内容。他把自己的活动同群众的命运联系起来。他愤怒地斥责战争的操纵者，对中国、东欧和犹太等被压迫民族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要消灭战争，只有根除产生战争的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战争的根源。罗曼·罗兰在后来写的《自传》中提到这篇文章在他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地位时说：“这样一篇论文，在当时具有宣告全面决裂的性质，不仅和战争决裂，而且和旧的社会决裂，和作为旧社会中心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秩序决裂。”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消息传到瑞士，罗兰为之振奋。他托卢那察尔斯基转给俄国一封贺信，贺信以激动人心的词句写道：

“俄罗斯的弟兄们，你们粉碎了身上的锁链，并一跃而赶上了大革命的法国。超越它自己，完成你们和我们的共同事业，为西方做出榜样，指给西方看：伟大的，自由的，团结一致的人民，是能够击退帝国主义势力从内外所发动的进攻的。”（见《战时日记》）这就是五月一日发表在《明日》杂志上闻名于世的论文《给自由的和使世界获得自由的俄国》的初稿。

帝国主义战争使年老的人失去依靠，幼小的孩子失去照应，鳏寡孤独，啼饥号寒的现实使罗曼·罗兰夜不成眠。一九一七年六月，罗兰收到了寄自瑞典的诺贝尔奖汇款后，毫不犹豫地全部捐赠给了法国救济战争难民的几个民间组织和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他希望通过它们，救济那些由于可恶的帝国主义战争而陷入苦难中的人们。

“精神独立宣言”

星光闪烁，春风徐徐，在日内瓦湖边的别墅里，《明日》杂志主编吉尔波闪动着—双机智、明亮的眼睛，悄声地告诉罗曼·罗兰：列宁要回国了，同去的还有不少人，列宁问罗曼·罗兰想不想同去。罗兰凝神片刻，他觉得目前对他来说还没有这个必要，于是婉言回绝了。隔了几天，罗曼·罗兰在一个俄国侨民家里见到了卢那察尔斯基，才知道列宁已于三天前乘密封的国际列车车厢横穿德国，取道丹麦，回俄国去了，同去的有四十人。一个月以后，罗曼·罗兰知道卢那察尔斯基和一百多名革命者也一起潜回俄国了。罗兰知道以后比较兴奋，激动，当时，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但还不是革命的直接参加者。

不久，瑞士传来了俄国发生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消息，罗兰对这划时代的革命仍然是热情支持的，但他对革命的暴力心怀戒心。可是当英国、法国、德国，甚至瑞士的报纸疯狂地攻击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时候，罗曼·罗兰挺身而出，他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于宏伟的社会实验。”这声音像响亮的洪钟在暗夜中回荡，使一些陷入恶梦中的人们为之一惊。

一九一八年八月，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在莫斯科遇刺，罗兰得知伟大文学家高尔基为继承列宁的革命事业而毅然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消息后，罗兰十分赞赏高尔基的这个态度，他称许这个行动是“高尚的行动”。同年十月，苏联驻瑞士大使馆通知罗曼·罗兰被选为苏联科学院普通院士，罗兰含着微笑接受了这个荣誉。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战后，欧洲知识界由于战争造成物质上的重大损失和精神上的巨大创伤，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一种对战争的惊恐和对人生持否定态度的悲观消极情绪；哲学界出现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直觉论，唯意志论等；文艺界则出现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等。罗曼·罗兰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文艺观，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但在社会观上，罗兰这时也出现了思想矛盾，他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但又缺乏必胜的信心。他把暴力同人道对立，把革命同博爱对立，他注重精神力量，甚至想从印度哲学中寻找—条社会和谐的新路。一九一九年三月，他起草《精神独立宣言》，企图将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抵制未来的战争。他提出精神优于物质，个人优于群

众，宣传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核心的泛爱人类和非暴力等思想。

一九一九年五月，罗曼·罗兰得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从瑞士赶回巴黎。不久，母亲病逝，罗兰也病倒在巴黎。这年六月，凡尔赛和约签字，同年同月，罗兰在巴黎《人道报》上正式发表《精神独立宣言》。当时罗兰感到世界大战有再次爆发的可能，他号召各国知识分子对本国反动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防止新的战争发生。各国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很难从政治思想上联合起来。宣言中所提倡的人类大团结的思想也只是空谈。事实上在宣言上签名的人除了巴比塞、罗素、爱因斯坦、泰戈尔、高尔基等国际闻名之士外寥寥无几，有的还提出了反驳意见。

巴比塞组织了“光明社”，创办了“光明报”，几次约罗曼·罗兰参加，但都遭到了拒绝。巴比塞写文章批评对革命持保留态度的“罗兰主义”，巴比塞并不否认罗兰是拥护革命的，但认为一个革命者不应当保留“精神独立”的立场而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论战继续了两年，最后巴比塞问罗兰：“你说你拥护革命，那很好，可是，革命总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你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呢？”罗兰回答了两点：一是对掌政者施加精神压力，二是良心反抗，对于犯罪的政府，个人拒绝表示同意，拒绝给予协助。罗兰还说：“这种良心反抗是最了不起的革命战斗武器，最卑微的人们和最显贵的人们都能使用，甘地在印度使用这个武器挖大不列颠的墙角。”

罗曼·罗兰这时的思想矛盾不仅表现在他和巴比塞的争论中，还表现在二十年代他所写的几部“革命戏剧”和“传记文学”中。罗曼·罗兰肯定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又赞同吉伦特党而指责雅各宾党，把革命写成自发暴乱行为，既表现了罗兰对历史的前进性的肯定，又反映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

罗曼·罗兰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告别巴黎回到瑞士，在维尔纳芙镇租了一所楼房，取名奥尔迦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十多年。

罗曼·罗兰居住巴黎的三年，日夜深索今后世界发展的方向，由于在巴黎接触了印度的一些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对印度兴起的不抵抗运动感到兴趣，表示今后要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印度与亚洲方面。

泰戈尔和甘地

罗曼·罗兰从一九一五年开始接触印度政治思潮。侨居在伦敦的印度学者戈马拉斯瓦弥寄画册、图片和文章给罗兰。罗兰不禁对之神往，他感到印度这个东方世界太丰富、太饱满了！他想，如果还能活十年、二十年，他就要引导法国人的思想，到他们从未窥见过的世界高原上去。罗曼·罗兰用了十年时间研究印度，发表了三部介绍印度的精神世界的专著：《马哈德马·甘地》、《拉马克里希那传》和《维弗迦南达传》。

一九一六年夏天，罗曼·罗兰翻阅一本美国杂志时，偶然读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全文，中心意思是说“西方物质文明”和“东方精神文明”融合，以实现其人类友爱和睦的大家庭的理想。罗曼·罗兰连声叫好，他说这篇讲演标志着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泰戈尔提出建立一个

巴比塞（1873—1935）法国进步作家，法共党员，新闻记者，著有《火线下》，创立国际进步作家组织《光明社》，主编《光明》杂志，组织反帝大同盟。

国际性的文化组织的主张正符合罗兰长期想要成立国际大学的幻想。

一九二一年四月，泰戈尔在他儿子的陪同下访问了住在巴黎的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喜欢泰戈尔的非凡仪表和他那洋溢着诗情画意的谈吐。五年之后，泰戈尔到欧洲出访，在日内瓦停留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到罗兰的奥尔迦别墅做客，两人喁喁细语，手携手地漫步在日内瓦湖畔，泰戈尔离开日内瓦那天，两人依依惜别，不愿分手。四年之后，泰戈尔又一次到日内瓦造访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这时已越来越多地接受了苏联革命的影响，对法西斯的斗争越来越勇敢坚决，因此，在他同泰戈尔晤谈时已感到格格不入了。罗兰在日记中写道：“我热爱他，敬仰他。然而没有一次和他晤谈时，我不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怒火，我恨不得忿然离座，置之不顾而去，恨不得将他那庄严的外表，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矜持，砸得粉碎。”

罗曼·罗兰在一九二二年同一位印度朋友的谈话中，第一次听到马哈德马·甘地的名字，后来泰戈尔讲到甘地高尚的人格，使罗兰非常敬佩。这以后，罗兰致力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的研究。因为罗兰当时感觉到欧洲的狂风暴雨就要来到，他在寻求一个藏身洞，一堵垣墙，借以抵御风暴。

罗曼·罗兰研究甘地思想的过程中，他的妹妹玛特兰·罗兰精通英语，是罗曼·罗兰查阅英语资料的得力助手。一年多时间，兄妹二人几乎每天晚上都一起在灯下阅读有关甘地的资料。一九二三年春，罗曼·罗兰写成《甘地传》之后不久，又出版了甘地的政论集《年轻的印度》（法文版），罗兰给甘地的政论集写了序言。

甘地是主张“非暴力”的。甘地说：“非暴力并不是对凶恶的人卑躬屈节。非暴力是用灵魂的全部力量对抗暴君的意志。这样，一个单独的人就能向一个帝国主义挑战而使之崩溃。”甘地在南非和印度的政治活动中只要求殖民主义者大发慈悲，给殖民地人民以生存的条件和适量的自由，从不反对殖民主义者的统治，甘地的行动方式就是演讲、绝食、静坐甚至坐牢，以不流血的非暴力方式进行斗争。罗曼·罗兰赞许甘地的人格和精神。在罗兰看来，甘地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实践者，罗兰当时对甘地主义是颇有兴趣的。

甘地从印度监狱里出来治病，他写信给罗曼·罗兰，说他很想到欧洲旅行，并希望能够有机会见到他。甘地的行动是受监视的，甘地想要到欧洲旅行的计划一直到八年后才得以实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甘地由英国到法国，再由法国到瑞士。这时罗曼·罗兰早已由巴黎回瑞士，住在日内瓦。甘地到日内瓦与罗兰促膝长谈了六天。罗兰发现他这时的思想同甘地的思想有较大的距离，他已经感觉到把甘地的思想搬到欧洲来不合适了。罗曼·罗兰在十二月九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晚，我感觉到甘地的道路已经清楚地划定了。而且在许多问题上，他的道路和我的道路迥然不同。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各人都明白往何处去。对甘地和他的伙伴来说，甘地的道路是很好的。我并不愿意他采取另一条道路。我钦佩和热爱他的道路。但是我们两人有什么可谈呢？除非，如同第一天和他见面时我们所做的那样，执着他的双手，互相注视，相对微笑。”罗兰这时对甘地主义原有的兴趣已消失了。

反法西斯的斗士

二十年代末，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德、意、日法西斯

势力重新抬头。法国的执政者为摆脱危机成立“火十字团”，准备入侵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当时坚决反对法西斯的知名人士有巴比塞、瓦扬—古久里、布洛克、郎之万等人。罗曼·罗兰在反法西斯风暴中坚定不移地斗争着，他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巴比塞密切合作，成立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并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在巴黎召开第一次反法西斯群众大会。罗曼·罗兰、巴比塞、爱因斯坦担任了大会的名誉主席，担任执行主席的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共产党员郎之万。这次反法西斯群众大会给战后正在欧洲日益抬头的法西斯势力以迎头痛击。

罗曼·罗兰熟悉意大利，热爱意大利人民，他热情支持意大利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他对意大利的反法西斯力量不争取共产党人支持的作法很不满意。有一个流亡在外的意大利反法西斯组织：“意大利自由之友的国际民主同盟”，这个组织以反法西斯为名进行反共活动。他们争取罗兰参加这个所谓的“第三运动”，遭到罗曼·罗兰断然拒绝。罗兰回答他们说：“虽然我不是共产党人……我理解共产主义是一股新的力量，它是形成反法西斯的最强劲的战斗队之一。意大利的反法西斯力量不争取共产党人的支持，我觉得十分遗憾。”

罗曼·罗兰义正词严地写文章谴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文章写道：“建立在意大利法西斯原则上的任何制度，对人类的良心而言，都是一种堕落。它藐视最神圣的自由权，强迫人们接受谎言，制造恐怖，靠这一切来实行统治。企图将法西斯引入法国的任何行动，都是犯罪。”

一九三二年夏天，身患重病的巴比塞竭尽全力筹备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反战大会。这次大会规模宏大，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千二百人，代表了三万个反战组织的三十万人，这是一次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的大检阅。罗曼·罗兰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发言中号召全世界不同信仰，不同政见的党派、团体以及无党派人士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战争。他强调捍卫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他说“苏联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我们的共同责任就是保卫苏联。反对勾结在一起的各国帝国主义，反对指向苏联的一切威胁。”由于荷兰政府不给苏联代表以入境签证，苏联代表未能参加大会，但罗兰认为，苏联在道义方面的声援非常有力地支持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一九三四年终于进入了国际联盟。

以希特勒为头子的德国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党）篡夺了国家政权，战争威胁日益严重。罗曼·罗兰勇敢地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在“打倒棕色瘟疫”的传单上签名。雪片似的传单四处散发，对希特勒法西斯造成极大的舆论威胁。他们企图拉拢罗兰，利用他在西方知识界的影响，扩大他们的反动势力。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德国驻日内瓦领事通知罗曼·罗兰，说德国总统兴登堡为表彰他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成就，委托他送给罗曼·罗兰一枚“歌德勋章”。罗曼·罗兰答复德国领事说：“今天在德国发生的一切，如自由的被弃掷，反对党的受迫害，犹太人成为粗暴和卑鄙的压迫对象，凡此种种，都引起全世界的公愤，也激发我个人的义愤。这样的政策，是对于人类犯罪。”罗兰愤然拒绝。德国法西斯拉拢的计谋失败，转而对他使用威吓手段。他们首先制造“国会纵火案”诬陷并逮捕了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等革命同志，妄图造成世界舆论的谴责。罗曼·罗兰积极营救季米特洛夫等同志，并且在报纸上公开揭露纳粹头子的阴谋，点名指责其可卑的罪

行。罗曼·罗兰还写信给驻巴黎的德国大使，提出措词激烈的强烈抗议。德国纳粹党恼羞成怒，把罗曼·罗兰当作“德国的头号敌人”。德国的出版商遵照政府旨意将已经印完的罗曼·罗兰的论文集《自由精神》的德译本全部销毁，出版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母与子》德译本的出版社停止出最后三卷。罗曼·罗兰著作的其他德译本也被当作禁书同一切革命的进步书籍一样在德国遭到焚烧。罗曼·罗兰丝毫没有因此而减少他反法西斯的斗争热情，相反地，他比以往斗争得更加积极而坚决了。罗曼·罗兰发表演说，撰写文章，不仅激烈地反对德国的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还反对侵略亚非各国人民的世界殖民主义。罗曼·罗兰在一九三三年四月《欧罗巴》月刊上发表了《反对殖民帝国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列举了英、法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印度支那、印尼和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罗兰号召“全世界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团结一致，为加速军国主义的灭亡而斗争！”

和中国人民友好

罗曼·罗兰一向同情和支持在苦难岁月中生活和斗争的中国人民。一九一六年年底，罗曼·罗兰写文章谴责帝国主义对东欧和东方人民的侵略行径，指出“在两次战争和一种侮辱的条约签订之后，中国被英国强迫接受毒物（指鸦片烟），据说英国在一个世纪内从这些毒物中赚取了一百一十亿。”罗曼·罗兰认为孙中山是使旧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向导和模范，他还邀请曾经到过中国并十分熟悉和热爱中国文化的音乐家路易·赖鲁雅写一篇介绍孙中山的文章。罗曼·罗兰还在“全世界各党派反战大会”上讲到，“中国巨人般的身体，被各帝国主义从外面，同时又被帝国主义的同谋者从内部撕成碎片的身体，正在英勇地站起来，而且将从痛苦的海洋中重新出现。”

一九二六年一月《欧罗巴》杂志为罗曼·罗兰六十寿辰出专号表示庆贺。罗兰这时住在瑞士维尔纳芙的奥尔迦别墅，他刚读完中国留学生敬隐渔寄赠与他的译成法文的《阿Q正传》。罗曼·罗兰感到“《阿Q正传》是高超的艺术作品，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的惨像遂留在记忆里了。”罗曼·罗兰还写信给巴查尔什特，建议他将《阿Q正传》在《欧罗巴》月刊上发表。信上说：

“我手中有一篇不长的故事（较长的短篇小说）的稿子，是当前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写的，由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青年中国译者敬隐渔译成法文。这是乡村中的一个穷极无聊的家伙的故事。这个人一半是流浪汉，困苦潦倒，被人瞧不起，而且他确实也有使人瞧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自得其乐，并且十分自豪（因为一个人既然扎根于生活之中，就不得不有点值得自豪的理由！）。最后，他被枪毙了，在革命时期被枪毙，不知道为什么。使他郁郁不乐的却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人们叫他在供词下边画一个圆圈时（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的圆圈画得不圆。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乎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会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你愿意读一读这篇不长的稿件吗？如果不，我只好另作处理。可是，请你还是把它发表在《欧罗巴》上吧！我预先告诉你，敬隐渔如果受到鼓励，会供给出版社一部中国当代小说集或故事集的材料。我相信，巴黎的任何刊

物或出版社都没有接触过当代中国文学。我再加上一句：敬隐渔的法语知识是罕见的，在他的译稿中，只有很少几个错误。”

罗曼·罗兰给敬隐渔的回信上还写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类似阿Q的农民。”由于罗曼·罗兰的推荐和对《阿Q正传》的颇有见地的评价，闻名欧洲的《欧罗巴》月刊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的第四十一期和六月出版的第四十二期上登载出来了。敬隐渔高兴地写信给鲁迅先生，提到罗曼·罗兰是怎样称赞《阿Q正传》的，并且说：“我想你也喜欢添了这样一位海外知音。”

《阿Q正传》法文译本出版之后，敬隐渔用法文编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也在《欧罗巴》杂志的里埃德尔书局出版了。选集包括了鲁迅、茅盾、郁达夫、冰心、落花生等中国著名作家的九篇作品。鲁迅先生的作品除《阿Q正传》之外，还有《孔乙己》和《故乡》。这本小说集后来被米尔斯译成英文，将书名改为《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于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从此，我国的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流传于欧美各国。

罗曼·罗兰以他伟大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积极地献身于人类进步事业的行动赢得了全世界人民，包括我们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崇敬。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诗人萧三同志参加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进步人民热烈祝贺罗曼·罗兰七十岁寿辰晚会。罗曼·罗兰和他的夫人从无线电电波里收听了晚会的实况广播：有高尔基的书面祝辞，有著名的作家、演员朗诵罗曼·罗兰的作品，会上还放映了有关罗曼·罗兰活动的影片，萧三（就是埃弥·萧）的节目是第六个，他用法语作了热情的讲话。他说：“罗曼·罗兰是中国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他也懂得中国文学。罗曼·罗兰说过，我永远忘不了阿Q这个形象。罗曼·罗兰还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而深深地感动。罗曼·罗兰是中国的挚友，‘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曾发出号召，标题是《快援助，捉住凶手》。现在，中国红军工农武装部队在火线上，我代表中国被压迫者向罗曼·罗兰祝贺七旬大寿！并希望罗曼·罗兰能看到中国民主，得到解放！”萧三同志在大会上作的颂诗是：

法兰西，
你这山河秀丽的国家，
罗曼·罗兰，法兰西的语言大师，你的作品名扬四海，似万丈长虹划破天空我看见
罗曼·罗兰像山林中的樵夫，在遍野荆棘中，
寻找初春的嫩草。松树对他歌唱，
柳树向他点头，
野花在他面前摇曳，这一切他都没有发现。他只听到
枝头可爱的小鸟，在呼唤春天。
樵夫倚柴门，
忧郁惆怅。
身居斗室，
心中翻着波浪。
我看见罗曼·罗兰似渔父站在大河岸边黄昏垂钓中，
他没注意河水潺潺，
鱼儿尽兴游玩。

也没注意，
河面泛起的层层漪涟。
他只是在凝望，
水中颤动的新月一弯。
渔父遥对夜空：
今晚又无鱼请客吃饭。
常言道：
“长幼岂能碍友情。”
……
我们虽不相识，
但我对您的景仰，
跨过了万水千山。
只要想到您，
一股由衷的热情
使我的心点燃、点燃……

祝贺罗曼·罗兰七十岁寿辰不久，埃弥·萧收到了罗曼·罗兰亲笔题赠的两张照片，照片的背面是用黑色流畅的法文手写体写的：“衷心地感谢您美丽的诗篇，它使我见到一张美丽的中国过去的图画，维尔纳芙镇的老渔父向您致以兄弟般的敬礼！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罗曼·罗兰。”照片的正面，远山如黛，和煦的阳光掠过苍翠的山顶，一只小船的双叶白帆刚刚升起。岸边是茂密的丛林，湖面是那么静谧……。

这珍贵的照片，这亲切的题词是罗曼·罗兰同中国人民友谊的纪念，也是法中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去莫斯科访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俄国革命家流亡在瑞士。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在瑞士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列宁在瑞士时已注意到罗曼·罗兰的进步活动，但没有直接见面。而卢那察尔斯基早在一九一五年初就同罗曼·罗兰有了交往，由于卢那察尔斯基的介绍，罗曼·罗兰非常敬爱高尔基，他写信给他的父亲说：“高尔基是现代欧洲能和我有共同观点的绝无仅有的伟大人物之一。”罗曼·罗兰第一次收到高尔基从彼得格勒发给他的信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底，高尔基约请罗曼·罗兰写一篇适合于儿童阅读的贝多芬传记，高尔基亲热地称呼罗曼·罗兰为“亲爱的和十分钦仰的罗曼·罗兰同志”。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卢那察尔斯基在日内瓦召开纪念高尔基文学生涯二十五周年座谈会，罗兰是这次会议的主席，他的书面发言的题日是“致马克辛·高尔基”，他把高尔基的出现，看作是因托尔斯泰逝世而遭受的损失终于得到了弥补。卢那察尔斯基在瑞士经常会晤罗曼·罗兰。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遭到苏联国内和国外的所谓“革命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诅咒和叫骂，而罗曼·罗兰始终没有参加这个反苏大合唱，当时有的左派作家如阿纳多尔，法朗士都参加到这个合唱之中了，罗曼·罗兰批评了法朗士的错误举动。

一九二二年罗兰答复《人道报》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文章说：“一定要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只要它是尊重自由和人道的。”后来，罗兰认识到，“除了无产阶级为之战斗的事业之外，任何‘自由’都是欺人之谈。”

一九二七年国际反苏反共的势力凶猛异常，欧洲各国反动派勾结一起围攻苏联，英国政府甚至宣布与苏联绝交。逃亡到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企图蒙蔽罗兰，想要他说一句拥护《自由人》这个刊物的话，罗兰头脑清醒地答复《自由人》说：“无论对苏联领导人有什么不满，我必须对全欧洲自由的人们大声疾呼：今天的苏联处于危险的境地，万一俄国被摧毁，那么不仅全世界无产阶级将被奴役，一切社会自由与个人自由，必将同归于尽……世界将倒退几个阶段。欧洲各国人民眼看要被卷入帝国主义全线专政的战争。”罗曼·罗兰在苏联危难时给予支持的友好态度，使苏联认定罗曼·罗兰是自己真诚的朋友。一九二七年九月已经是苏维埃政府的文教部长的卢那察尔斯基写信给罗曼·罗兰，说他代表布尔什维克党欢迎他给莫斯科新创刊的《革命文化》杂志撰稿。罗兰复信说：“我从不讳言我和俄国革命之间的一切距离……然而，我曾经是最早承认它的伟大和它的历史必要性的人之一。我始终这样承认，而且相信它是人类社会的强有力的先锋。”

伟大的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苏联驻巴黎大使馆转达了苏联对外文协邀请罗曼·罗兰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大典的信，由于罗兰当时健康状况不佳未赴苏联，但他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

罗曼·罗兰同情和赞助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态度，苏联是肯定的，欢迎的，但对他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注意了进行帮助教育和抵制。一九二九年五月，苏联逮捕了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意大利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弗朗采斯戈·盖希。盖希的一位法国朋友写信给罗曼·罗兰要求营救盖希。罗兰写信给高尔基要高尔基出面进行营救，高尔基认为不妥，未予理睬，为此两人的通信联系中断了一个时期。最后还是罗曼·罗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了高尔基的正确观点。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高尔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致人道主义者们的》的文章，批评了罗曼·罗兰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四月，罗曼·罗兰写了《向过去告别》。这篇文章是罗曼·罗兰思想转变的明显标志，他批判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悲观思想，他宣布从此以后同这种思想决裂。这篇文章还给自己指出了光辉灿烂的前景。

罗曼·罗兰始终是热爱苏联、拥护苏联的。他把苏联叫作“劳动共和国”，把社会主义苏联看作人类光辉的雏形。苏联人民对罗曼·罗兰也是热爱的，他们把罗曼·罗兰叫做“我们的罗曼·罗兰”。有的年轻夫妇给孩子取名克利斯朵夫。一九三二年四月，罗曼·罗兰写给苏联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在苏联，人们把我说成是你们的罗曼·罗兰，我呢，我也在这儿说：我的苏联。”可见罗曼·罗兰对苏联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苏联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以主席高尔基的名义给罗曼·罗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致敬信。罗曼·罗兰感动地回复说：“我觉得对于你们和苏联的劳动大众同志们，比对西方的我的同行们更为亲近，虽然我对法国的大地和人民始终怀着热爱与深情，可是你们苏联是当今世界上向未来进军的先锋队，我要求，在你们的行列中有我的位置。”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偕同夫人玛利亚

访问苏联。受到了极其隆重而热烈的欢迎。

六月二十六日罗曼·罗兰写给妹妹的信是这样描述的：“人们这样接待我，是和我的身份完全不相称的。有时候使我感到有点儿吃不消，然而也是十分动人的。昨晚，在大剧院里，他们指定给我的座位是以前沙皇专用的宽大包厢。这个包厢平常是给外交使团使用的。这次让外交使团坐到别处去了。人们没完没了地向我欢呼，不论在剧院外边，或在剧院里面，在剧院的入口处，接着在第三场中间休息的片刻，在剧院的外边，台阶上下，广场上，一群热情的男人和妇女，向我欢呼。谁还能说莫斯科的群众是军队编制的！因为他们热情洋溢的表现和上级的指示可以说恰好相反，指示是要让我安静。群众的热情使我十分感动。在纷乱中，我努力和几个人握手。但是，我得有十万只手才够用。你可以想象，你的年老的哥哥，站在大包厢中，高举双臂，拙笨地，向左边，向右边，挥手致意。但是他没有太慌张，他像看戏一样，注视周围的一切和他自己。”

罗曼·罗兰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每日每夜地写日记和书信，真实地记下了他访苏的见闻和观感。

在高尔基家里做客

罗曼·罗兰在苏联访问了二十多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马克辛·高尔基的家里做客。

在离莫斯科市大约五十公里的地方，在莫斯科河畔茵茵草地上矗立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别墅，这就是高尔基的家，是苏维埃政府让高尔基工作、生活和静养身体的地方。高尔基的家里整天人来客往，络绎不绝。开饭的长桌上座无虚席，罗曼·罗兰和高尔基坐在显要的位置上，长桌的中央坐了一些儿童，他们由保姆兼教师的女同志带领着，长桌的一端坐着出出进进的家里人，另一端经常坐的是各式各样的来访者。高尔基比罗曼·罗兰大两岁，当时的健康情况不太好，有一个女管理员兼护士的同志看护他。来高尔基家里做客的人很多，有中央领导人，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还有学者、艺术家。有一次，罗曼·罗兰陪同高尔基接见了八九十人的文艺界人士，他们还在大厅里歌唱、演出。高尔基在宾客满座时总是喜形于色，谈笑风生。罗曼·罗兰发现高尔基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说不完的趣闻轶事，感到十分惊异。有一次，罗曼·罗兰看到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到高尔基家里来共进晚餐。在餐桌上，罗曼·罗兰不时被斯大林的幽默、风趣的谈笑引得哈哈大笑。罗曼·罗兰在访问期间，两次见到斯大林，除了这次之外，另一次是他刚到莫斯科的时候。

罗曼·罗兰在高尔基家中，还见到了法国文学家阿尼西莫夫，他正在写罗曼·罗兰的传记。阿尼西莫夫当时还很年轻，他告诉罗曼·罗兰：“在苏联农民家里不但可以见到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连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都可以见到，而且他们都喜爱《母与子》的最后几卷。”罗曼·罗兰听了非常高兴。阿尼西莫夫后来担任了外国文学研究机构的领导者。

罗曼·罗兰对这次访苏的印象是很好的，但遗憾的是他和高尔基由于言语不通无法直接讲话，高尔基不会法语，罗兰不懂俄语，两个人的交谈全靠译员帮助，这是他们深以为憾的事。已经七十岁的罗曼·罗兰回到瑞士之后

开始勤奋地学习俄语，他希望在下一次会见高尔基时不用译员就可以直接交谈。可惜两人分别不到一年，高尔基因病逝世。

高尔基病逝的噩耗传来，罗曼·罗兰感到万分悲痛。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我过去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对高尔基的感情有这么深厚！朋友一旦消失，友情的深度反而被我发觉了。我们两人间的友爱，悲剧地显露出来了。我怀着极大的痛苦，感觉到，我和他分别以来，我是天天在盼望着和他再一次会面的。我敢说，高尔基也一样，他也在盼望和我再见。一九三五年七月底，我们在莫斯科车站分手的时候，是我们两人间真正的亲密友情交流的起点。我们满以为这种友情能够继续下去！我学习俄语，为的是能和他单独交谈。我们有这么多的话要互相倾吐。”

罗曼·罗兰和高尔基的友谊，决不是一般的同行交情。他们的友谊是深厚的，真挚的。罗曼·罗兰对高尔基无比尊重，敬爱，而高尔基对罗曼·罗兰也倍加推崇、赞赏。高尔基写信给罗曼·罗兰说：“在今天的欧洲，我不知道有谁像你那样，满腔热血和激情，而且极少教条地考虑了人和人类的未来。”罗兰六十寿辰时，高尔基曾经称赞罗曼·罗兰是“一位绝无仅有的斗争者，他固执地、不倦地致力于帮助在目前的阴暗岁月里，不懈地创造文化价值的人们。”

罗曼·罗兰和高尔基之间的友谊不仅推进了苏联和西方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还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促进了思想进步。高尔基在列宁逝世后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多次谈到他对列宁的强烈的爱。他说，他热爱列宁，愤怒也爱，激情横溢也爱。他还说到，他同列宁争论，双方互相热爱，但谁也不肯在争论中放下武器。列宁去世后，高尔基想起列宁讲过的话，他信服列宁，认为列宁是对的。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还写到：“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我始终坚信只有列宁能领导俄国广大农民群众和成千上万的士兵脱离混乱状况，走上推动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高尔基对列宁的这个认识也积极影响到罗曼·罗兰对此深信不疑。捷尔仁斯基逝世，高尔基悲愤地说：“非力克斯·艾特蒙陀维奇之死是多么出人意外，多么不适时，多么岂有此理！”高尔基赞成严厉地打击反革命，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不主张使用暴力的罗曼·罗兰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高尔基热爱在社会主义沃土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新苗。在高尔基的影响下，罗曼·罗兰成了苏联文学的爱好者，他还为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法文译本写了序言。

罗曼·罗兰同高尔基的友谊，已发展为罗曼·罗兰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高尔基去世之后，罗曼·罗兰每天都收到来自苏联人民的充满了热情的大量的来信。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罗曼·罗兰已经七十岁了。法国的群众热情地向他祝贺。为了庆祝罗曼·罗兰的七十寿辰，巴黎的工人群众召开了庆祝大会，剧院里上演他的剧本。群众对他的爱戴和敬仰，使他十分激动。过去对他冷落过的亲朋故旧也纷纷重修旧好，这使年迈的罗兰心里感到温暖。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在瑞士侨居十六年之久的罗曼·罗兰怀着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决定重返祖国。罗兰把瑞士莱芒湖畔的奥尔逊别墅留给妹妹居

住。在法国，他在离他出生地克拉木西镇几里路的卫峙垒镇上购置了一所住宅，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底返回故乡。罗兰不满足于躺卧在故乡的怀抱中消闲度日，安享晚年。他每天照常伏案读书撰文。回乡的第一年，他继续写作音乐专著《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还写了《回忆录》、剧本《罗伯斯庇尔》和《贝济传》。

一九三九年九月，罗兰回乡才短短的两个年头，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又接踵而至。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和英国仓卒对德宣战。当法国总理达拉第向全国发出总动员令之后，罗曼·罗兰表示拥护这种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因为它是符合法国人民的利益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德国侵略军一举攻陷巴黎，百姓们四散逃命。德军的摩托部队向纵深推进，法军不战而退，公路上人仰马翻，尸横遍野。罗曼·罗兰卧病在床，为法国人民的命运担忧，为祖国民族的前途忧虑。

一小队德国兵驻扎在卫峙垒镇，罗兰的家就在小镇教堂的对面，德国鬼子荷枪实弹在罗兰住房附近目中无人地高声谈笑，粗声怒骂。罗兰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他在书架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罗曼·罗兰的图书，请勿乱动。”这是对前来抢掠的敌人发出的警告。罗兰还把一些没必要保存的文件、档案、笔记、手稿等付之一炬，以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

四年的蛰居生活结束了，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巴黎获得了解放，德寇溃退了，法国又恢复了原有的生气。罗曼·罗兰在法国沦陷的一年多时间写出了以歌颂爱国者贝济为内容的《贝济传》，贝济曾是高师的学生，于一九一四年牺牲在抵抗德军入侵的马恩河战役中。但贝济不是革命党人，他是沙文主义者，罗兰借贝济反侵略的精神以鼓励法国人民振作起来打击侵略者。

一九四四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来临了，罗曼·罗兰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被搀扶着乘车到巴黎苏联大使馆参加庆祝活动。罗兰这年已经七十八岁了，两个月之后，于十二月三十日太阳刚刚升起的清晨，在卫峙垒镇住宅猝然逝世。罗曼·罗兰的一生，正像他自己说过的：“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将要说：祝福吧，安静地休息了！安眠吧，我的头脑！安眠吧，我的双脚！你们都辛苦了。经过的道路是艰苦的，坎坷不平的。可是，无论如何，那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在那条路上，一步一个血迹，也是值得的。”

文学创作

小 引

罗曼·罗兰是世界上著名的多产作家，他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结束他的创作生涯。五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他写出了戏剧二十多种，传记文学十多种，小说五部，另有政论、戏剧评论、书简、自传等约计几百万字的著作。这个大作家正如高尔基所指出，在四方社会阴暗的岁月中，罗曼·罗兰是那些不知疲倦地不断地创造文化财富的人其中的一个。

罗曼·罗兰的文学创作时期正是资产阶级统治从全盛到衰落的时代，是资产阶级从进步过渡到反动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新生的无产阶级逐渐准备和集聚革命力量的时代。罗曼·罗兰的创作思想，生动而有力地反映了这一大动荡时期的社会思想状况。正如罗兰在回忆录中所写的：“我用作品使人们激昂起来！”罗兰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强，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比较杰出的。

戏剧文学

罗曼·罗兰是以戏剧创作开始，也是以戏剧创作结束他的文学家生涯的。他喜爱戏剧这种艺术。他说：“我爱戏剧，因为它使人在同样的感情激动之中，能够互相友爱地沟通。”

罗曼·罗兰一生大约写了二十多个剧本。最早写的六个剧本，没有留存下来。现在完整保存的剧本只有十二个，而十二个当中只有一半是上演过的。

罗曼·罗兰的剧本按其内容可分作：“信仰悲剧”、“革命戏剧”、和“反战戏剧”三大类。

“信仰悲剧”于一九一三年在巴黎出版，它包括《圣路易》（1894）、《阿爱尔特》（1895）、《理性的胜利》（1899）等。这组戏剧的主人公是作者理想中的英雄，他们不屈不挠地追求人生的崇高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是带有抽象的人道色彩的所谓真理、正义、自由。这类戏剧文学缺少物质环境的形象描写，真实感不强。《圣路易》取材于十三世纪法王路易九世的故事，国王路易在亲率十字军东征途中病死，描写了强烈的宗教感情。《阿爱尔特》取材于十七世纪的荷兰史，王子阿爱尔特矢志报仇复国，由于情人泄密，事败跳窗自杀身死，表现了民族感情的高涨。《理性的胜利》取材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表现了对理性的信仰。后来作家将这个剧本归入“革命戏剧集”了。这组戏剧歌颂了一切超乎个人利害关系，为崇高的信仰而作出的壮烈牺牲精神。这组悲剧创作的宗旨，是针对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以来国内普遍存在的消沉情绪，目的在于振奋民心，激发爱国热情。

“革命戏剧”，作者计划写十二部，只完成了八部，这就是：《群狼》（1898）、《理性的胜利》（1899）、《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爱与死的搏斗》（1925）、《百花盛开的复活节》（1926）、《流星》（1928）、《罗伯斯庇尔》（1939）。这组戏剧是以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主要题材，用大革命的激昂精神来鼓励、鞭策法国人民振作起来，积极进行反对强暴、清除外患的重大社会政治斗争。

《群狼》是第一个写法国大革命题材的剧本。共和国军官德·瓦隆，五十左右年纪，虽为营长，有多次显赫的战功，但由于他是贵族出身，遭到共和国军将士的猜疑和怀恨。有一个打扮成乡下人的间谍被共和国军捉住了，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封敌方（普鲁士王国）写给德·瓦隆的密信，为此，军法会议判他死刑，六小时后执行。独有知识分子（科学院院士）出身的营长特烈感到奇怪，他想：德·瓦隆有爵位，有智慧，有勇气，并非迫不得已参加革命，为什么要卖国？何况半年来他拚命地为正义而战是不容否认的。特烈满腹疑问，他同国民公会特派员格士乃一同提审了间谍，间谍供出那封信是假的，还供出共和国军的一位名叫美耳觉·霍布得的教员是叛徒，普军曾写信通知他怎样去做。间谍还说出这情况已告诉费拉营长。特烈要求特派员格士乃取消原判，主持公道。但格士乃却说：“我爱我的祖国甚于爱公道。”特烈气愤地说：“你以为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拚死命是为什么？是为了几位雅各宾党人的野心吗？是为了公道，国民才拿起武器起来战斗。如果国家有一天违反了公道，那么国家也就不免成为暴君污吏的窠巢。如果法兰西也变成了压迫者，也成了刽子手！那我宁可打碎它！”“只要有公道，便是天塌下来也可以！”有人说德·瓦隆是贵族，不主张改判。特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后，触犯刑律的真正罪人费拉，由于特派员等人的包庇，反诬特烈受了德·瓦隆的贿赂要害死他，特烈提出当面审讯间谍就可以明白一切，然而间谍已经被勒死了，叛徒霍布得又躲藏起来，费拉转守为攻，扬言判特烈的罪。特烈在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镇静地说：“我的家庭很贫寒，我抛下了我的妻室儿女，我的职务，我的安宁，尤其是我所更宝贵的研究工作，来把我的力量献给祖国。我从没有把这些当本钱来讨价还价。我什么官衔都不要，我打过十一次仗，我不得已而提起功劳来，……我们只该对理智说话。”特烈最后再次请求特派员格士乃说话，请他说一句真话，然而格士乃却从特烈的身边走了出去。无辜的德·瓦隆被当作卖国贼处以死刑了。

罗兰是以现代的思想充实了过去的历史事件的内容，表现作家对“德雷福斯事件”这一冤案的严正抗议。

继《群狼》之后，罗兰仍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创作了正剧《丹东》。

故事发生在一七九四年三四月间，地点在巴黎。法国人民经过流血奋斗建立了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革命政权——国民公会。革命刚刚胜利，人民生活还很苦，曾经对革命有过卓越功勋的丹东，反对实行恐怖政策。他说：“法兰西遍地是血腥了”，他主张“让共和国生聚吧。让人口和稻麦从返老还童的祖国里一齐冒出来吧！……我们种地吧。”丹东的自由观和幸福观同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形成尖锐的对立，罗伯斯庇尔认为“幸福就是德行”，指责丹东之流“滥用了这一神圣的名词来唤醒懦夫们的欲望，贪图不义的财富，忘却别人，只顾自己的额外享受。”罗伯斯庇尔是个坚忍、刻苦的人，共和国经济困难，他下令不吃肉，他见到谁在公众苦难的日子里大吃大喝，痛心极了。他主张实行恐怖政策，他说：“对待刽子手仁慈，便是对待被害人残忍。”罗伯斯庇尔怀疑所有的人，他用断头机绞杀了无数曾为共和国出生入死的将士，他下令逮捕了一八九二年拯救过共和国的律师兼国民公会议员丹东，逮捕了国民公会议员兼律师戴木兰，同时被捕的还有国民公会议员法柏尔、国民公会议长埃罗和国民公会议员及审判官费立普以及旅长魏德曼，在公判会上宣布他们的罪行是接受贿赂，密谋叛乱。由于丹东在革命法庭上富有煽动力的演讲，群众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吼声，狂怒的群众捣毁桌椅，占据

法庭，怒喊着：“我们要丹东！委员会谋杀爱国者呀！揍死委员会！”正当群众怒不可遏的时候，国民公会突然宣布：共和国物品粮食供应委员会通告大众，今晚有面粉和劈柴船来到伯尔西码头。物质利益引起全场一阵骚动，不一会儿，全场群众作鸟兽散。庭长借机宣判丹东等五人死刑，于当天，即公历四月五日在革命广场行刑。正如丹东所说：“我打开了墓穴，罗伯斯庇尔要跟在我后头的”，“没有我和他两个脑袋，革命便会失败”。丹东等人被处死，三个月之后，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罗伯斯庇尔也死在断头机下。

《丹东》这个剧本反映了雅各宾党人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表达了罗兰对个人道德的推崇和对暴力手段的否定，人民在这个剧本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剧本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也表现出缺乏组织的群众是容易被利用的，尤其容易被物质利益所引诱。

《丹东》发表之后，罗兰又以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创作了正剧《七月十四日》。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是巴黎的革命群众攻陷巴士底监狱，在法国土地上结束封建专制制度的伟大日子。七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巴黎人民攻下了巴士底，午后七时，市政厅的广场，欢乐的群众像海潮一般手里摇动着绿树枝从四面八方涌来，口里高喊着：“自由了！自由了！”得到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我们一定会付出代价。”群众也高喊：“我们一定会付出代价！”马拉向群众说：“亲爱的人民，你们一声不响地艰苦奋斗已经很久了！经过几百年来的苦难，才得到了现在的欢乐！自由是属于你们了，好好地保卫着你们的战利品吧！”作家以高昂的热情歌颂了这个伟大的壮举。作家赞颂了人民群众在斗争中高亢的英雄主义精神。剧本的不足之处，在于对群众的自发倾向描写过多，对群众的有组织的活动表现不够。

《罗伯斯庇尔》一剧是罗兰晚年创作的，对革命的暴力行动作了肯定，正确地评价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反战戏剧”包括《总有一天》（1903）和《里吕里》（1919）等几个剧本。《总有一天》这个剧本，是以一九二二年英帝国主义同荷兰老牌殖民主义争夺南非殖民地的战争为题材的时事剧，作家抨击了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现实，同情受苦的广大劳动人民。《里吕里》是寓意剧，既无人物也不分场次，每个出场的角色都是某种象征。中心主题就是反对一切战争，对正义战争与不义战争未从战争的性质上加以严格区别，反映了作家当时思想上存在着抽象的和平主义。

传记文学

罗曼·罗兰很早就倾心于英雄传记的写作，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写作英雄传记，他预计写几十种，有的未完成，已经发表的有十多种，如《米勒传》（1902）、《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基罗传》（1906）、《亨德尔传》（1910）、《托尔斯泰传》（1911）、《昂贝道格传》（1915）、《甘地传》（1924）、《贝济传》（1944）等。罗兰计划在每一本伟人传记中写出每个英雄人物的特殊品质和他们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罗曼·罗兰写作英雄传记的目的很明确。他说：“周围的空气是沉闷的。老旧的欧洲麻木在沉重污浊的气氛中。一种物质主义压抑在人们的思想上，它阻碍了各国政府和一般人们的行动。世界在它的谨慎、卑鄙和利己主义中窒息而死。世界喘

不过气来了。打开窗子吧！让自由流通的空气吹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吧！”罗曼·罗兰所写的英雄传记中，以《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和《托尔斯泰传》最具有代表性，通称“伟人三传”。

《贝多芬传》，作家运用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故事，以明丽而流畅的笔触，描写了贝多芬这位出生在德国篷恩小公国的伟大而杰出的作曲家的苦难童年，抒写了他一生的不幸和痛苦的遭遇，他对人生、社会的强烈不满，以及他那“雄狮”般的反抗性格，突出了他那才华横溢的绝世的音乐天才和坚忍不拔不向黑暗社会低头的钢铁意志。作家饱蘸辛酸、同情、愤恨与不平之墨，以其特有的富于感情色彩的笔致，时而如洪峰来临，山呼海啸，时而如涓涓细流，娓娓动听。

《贝多芬传》洋溢着反抗的激情和作家对于西方拜物主义的轻蔑。这部作品以它委婉的抒情笔调，刚健的清新的风格和英雄主义气概在西方知识界赢得了热烈的赞赏。《贝多芬传》可说是罗曼·罗兰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的副产品。他是为了写克利斯朵夫的童年来到贝多芬的故乡“绿色的莱茵”，获得了许多关于贝多芬的珍贵资料，于是贝多芬的一切如雨后溪水，在作家笔尖下自然流泻。《贝多芬传》的抒情节奏使罗兰自己陶醉，也使读者耳目一新。《贝多芬传》于一九〇三年发表之后，罗曼·罗兰一跃而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作家。

《贝多芬传》发表三年之后，罗曼·罗兰又发表了《米开朗基罗传》。

《米开朗基罗传》描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艺术三杰”之一的伟大雕塑家、画家、建筑家米开的基罗一生辛勤而悲惨的艺术生涯。作家以抒情、委婉的笔法写出了艺术家的惊人才华，同时又拉开了艺术家悲郁苦闷的思想帷幕。米开朗基罗生活在意大利政治混乱，经济衰退时期，他被几代教皇统治者役使，无休止地工作，他把一生全献给了艺术，然而他心绪忧郁，怏怏不乐，甚至想以死亡来解脱痛苦。这是个人天才与时代悲剧的矛盾。

《米开朗基罗传》发表五年之后，罗曼·罗兰发表了以文笔优美，细腻而真实著称于世的《托尔斯泰传》。

罗曼·罗兰以翔实的资料，崇敬的心情描述了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的生活、思想和文学创作活动，作家在对托尔斯泰的评论中有着十分精辟而独具特色的见解，从中能够窥见到罗曼·罗兰的思想和精神面貌。

小说创作

罗曼·罗兰一生出版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与子》、《哥拉·布勒尼翁》、《格莱昂波》、《比哀和吕丝》等多部中长篇小说。罗曼·罗兰在小说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戏剧创作，也超过他的传记文学。最为成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于本书的第四部分作专门评介，这里简介其余的几部小说。

《哥拉·布勒尼翁》（1913）是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它的正式出版是在大战结束之后。这部小说的风格不同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它是一部轻松活泼别具一格的作品。

艺术三杰 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雕塑、建筑方面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

小说的主人公哥拉·布勒尼翁是法国民间的手工艺人，他是法国中部高原上一个小镇的人，他擅长雕花刻板，精工制作木器。故事发生在一六一七年，小说用自叙体表现主人公一生的思想和活动。

哥拉五十一岁了，长得肥头大耳，满面油光，酒糟鼻子，酒杯不离手，笑谈不离口。他自己建造了一所木屋，有木工作坊，两个徒弟给他干活。他有四男一女，儿女都成家立业了，生活虽不算很富裕，但也比较舒适。不料七月初瘟疫突然袭来，镇上已经死了不少人了，死人的住屋要用火烧掉，哥拉也染上瘟疫了，为了房屋不被火烧掉，他躲进菜地草棚、狂饮葡萄酒，居然把他的病治好了。可是房屋已被烧成灰烬，东西被抢劫一空。年过半百的哥拉，无力恢复家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哥拉同镇上居民一起跟纵火抢劫的匪徒打了一仗，得胜之后，克拉木西镇的居民才得以安居乐业。

高尔基赞赏这部小说，他写信给罗曼·罗兰说，他一边读，一边笑，有时笑得眼泪直流。高尔基说：“在当前一般人思想混乱，仇恨和疯狂的情况下，这本书的出现是非常及时的。”

《格莱昂波》是罗曼·罗兰一九一六年动笔到一九二一年完成的一部反战小说。

格莱昂波是一个颇有声誉的法国诗人，他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小家庭，不料战争危机突然降临。他的二十岁的儿子在爱国激情的感召下从军了。几个月后得知儿子失踪的消息，格莱昂波受到了沉重打击。后来从儿子的战友口中，得知儿子战死前的痛苦心情，他明白了这不是一场爱国战争，而是一小撮野心家、财阀为满足他们的私欲而进行的肮脏的战争。从此格莱昂波写文章揭发战争贩子们的罪行，官方诬陷他，以叛国罪对他提起公诉，格莱昂波被沙文主义者挑动起来的群众侮辱、殴打，最后被刺身亡。

作家盛赞格莱昂波的献身精神，把主人公的死亡罩上基督福音的花环，是罗曼·罗兰宗教思想的直接表现。

《比哀和吕丝》是罗曼·罗兰根据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报纸上的一条新闻写下的中篇小说。

胆怯的姑娘吕丝在巴黎市区遭到德军第一次空袭时，仓皇地抓住了一个陌生男子的手，然后两人匆匆分开。几天以后，两人在公园相遇；多次见面之后，两人倾心相爱，准备在复活节到来那天举行婚礼。不料复活节的前夕，一对年轻的情人双双被德国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在教堂里。

这部小说控诉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反战主题鲜明集中，文笔简练朴素，人物形象鲜明突出。

代表作品介绍

《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花了十年时间写成的十卷本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的社会生活图景，提出了欧洲现代生活中和思想文化领域里众多的问题，通过主人公一生的经历表现了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想状况。这部作品被誉为二十世纪第一部最伟大的小说。

约翰·克利斯朵夫生于德国美丽的莱茵河畔的一座小城。这座小城很美，红色的屋顶、尖尖的屋脊、浓荫茂密的花园鳞次栉比地散落在一个山岗下，倒映在灰绿色的莱茵河水中。克利斯朵夫的家坐落在小城边上，走不多远就是山峦起伏的农村。透过美丽的自然景色，不难看出德国的现实是鄙陋而狭窄的，金钱门第观念渗透了一切，也渗透到每个人的意识中。

克利斯朵夫的祖父米希尔和父亲曼希沃都是宫廷的音乐师。米希尔是个外来户，没有财产，由于他音乐方面的才能娶了宫廷音乐师的女儿，他的社会地位不高，但存有不少幻想，对权势者怀着敬畏心理。他有着运动员的体格和容易动怒的脾气。有一次他在大发脾气之后被亲王解雇了，于是他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而曼希沃也曾表现得很有希望，钢琴弹得很不错，提琴的演技早就成熟了，他还会玩别的乐器。但由于他好酒贪杯，尤其是娶了当厨娘的妻子鲁意莎之后，他对杯中物更无节制，以致连父亲的乐队指挥职位也没能继承。米希尔对儿媳的地位也很不满意，本以为凭着儿子的教养，又是优秀的音乐家，长得又漂亮，很可以攀上一门体面的亲事，想不到儿子竟娶了既不门当户对，也不是音乐世家出身的姑娘，而姓克拉夫脱的，一百多年来就没娶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但鲁意莎进了克拉夫脱家的门，她就以贤慧、善良、克己的品性赢得了老头子的喜欢，每当鲁意莎有些难堪和不安的时候，老约翰总是安慰她说：“不用再翻什么旧账，只要老老实实尽自己的本分就是了。”“人生第一要尽本分”，这是约翰·米希尔的格言。

曼希沃怎么会同鲁意莎结这门亲事的？！鲁意莎从前是帮佣的，她个子矮小，没有血色，身体又弱，这个小户人家的女子也没追求他。她平时见到人总是怯生生的。可是谁也没料到，有一个晚上曼希沃在河边碰到鲁意莎，在芦苇丛中坐在她身旁，跟她订婚了。他们结婚后曼希沃感到后悔，鲁意莎时常辛酸地从他眼中看出了怨恨，诚惶诚恐地向他道歉。一会儿他原谅她，但过不一会儿又悔恨起来，酒店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他听任自己毫无出息地往下坡路上滚下去。而小约翰·克利斯朵夫便在这愁云惨雾的家庭中降世了。

小约翰长得不好看，爷爷说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小孩。一张虚肿的大胖脸，脸上和手上的皮肤是棕色的，暗红的，还有些黄黄的斑点。小约翰生性活泼，体格健壮。清晨，父母睡着，他仰卧在小床上，望着天花板上跳舞的光线，他高声笑了。父亲的睡眠受到干扰，气冲冲地咕噜了一声，他赶快钻进被窝憋住气。过了一会儿，小脸又从被窝里探出来，听着四处的声音出神，不知不觉地哼着唱着，惹得父亲嚷道：“你这驴子老是不肯安静！等着吧，让我来拧你的耳朵！”于是他又躲进被窝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他吓坏了，同时想到人家把他比作驴子，又禁不住要笑出声来，他在被窝里学

驴叫，这一下可挨了打了，他使劲儿哭。他做了什么坏事呢？不过是想笑，想动，可是不准笑，不准动。老这么躺着，他什么时候才让起来呢？有一次，他偷偷溜下床，爬上椅子去开门时跌了一跤，他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结果挨了一顿打。他老是挨打。

小克利斯朵夫在父亲面前是不自由的，但跟祖父在一起的时候是愉快的。祖父给他讲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故事，他说拿破仑是个大人物，但他也是个坏蛋、野兽，没有道德的人。祖父的话使小克利斯朵夫产生了要做个大人物的念头。老祖父还带着小克利斯朵夫出去玩，有时乘坐乡下人赶的马车，欣赏莱茵河岸如画的风光。岸上曲曲弯弯的小路差不多和水面一样平，路边是又密又软的草，榛树俯在水面上，一半已经淹没在水里。一群小苍蝇在那里飞转。一条小船让平静的河水推送着悄悄地驶过。暮霭苍茫，空气凉爽，河水闪着银灰色的光，涟波吮着柳枝。这一派美丽的风光抚慰着小克利斯朵夫幼小的心灵，一种快意油然而生，当他满怀愉快回到家里，只听见蟋蟀在鸣叫，一进门便是妈妈可爱的脸庞在微笑……克利斯朵夫爱他的妈妈，爱他的祖父，爱一切，爱一切的人与物。克利斯朵夫有着充沛和过剩的精力以及欢乐与骄傲，他有一股永不倦怠的热情，他相信人间是幸福的，他拿出他所有的热情去追求幸福！

他真的能得到幸福吗？

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冷酷的人生，他反抗过，但终于叫他屈服了。

小克利斯朵夫开始懂事，正是家境最艰难的时候。他只有六岁的年纪，然而却要照顾一个三岁和一个四岁的弟弟，他的母亲为了生活，常常给人作厨娘。克利斯朵夫忍受不了别人对母亲的轻蔑，尤其是富家子弟加在他身上的欺侮，他深感不平，十分气愤。有一次，克利斯朵夫不顾一切地将欺负他的大少爷狠揍了一顿，父母亲不问情由地打他，骂他，还要他向富人认错下跪。克利斯朵夫感到父母亲的卑躬屈膝态度很可耻，他心中原有的一切尊崇都发生了动摇：对父母的尊敬与钦佩，对人生的信念，希望爱人家，同时也得到人家的爱的天真的渴望，盲目而绝对的道德信仰，一股脑儿都给推翻了。他拚命地乱打乱撞，大号大叫，他幼小的年纪，已经开始尝到了人间的不公道。

家里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每人两个马铃薯一顿饭的局面也难以维持了。克利斯朵夫经常挨饿，有时他饿得发抖，头痛、胸痛，但他忍耐不说，而他的父亲酒瘾却越来越大，经常发酒疯。

克利斯朵夫的祖父为了满足克利斯朵夫对音乐的爱好的爱好，他修好了一架破烂不堪的旧钢琴给孙子使用。克利斯朵夫对音乐很敏感，正当他在音响的王国中徘徊时被他父亲发现了他的音乐天才，出于光耀门楣的需要热心指教他，还带他参加音乐会。由于曼希沃采用老式的方法训练，使他受不了。克利斯朵夫起初对父亲是感激的，后来竟憋不住，试着反抗了，他的反抗举动遭到父亲严厉的责打。只要他弹错一个音，父亲就用戒尺打他的手指，甚至把他推出门外。克利斯朵夫宁可跳楼而死也不愿屈服，他为了不让父亲把他训练成一头玩把戏的动物拿到人前去卖弄而拚死地反抗着。克利斯朵夫富于幻想，热爱大自然，善于联想。他时常隔窗眺望流淌的莱茵河。他想：它上哪儿去呢？什么也拦不住它，不分昼夜，不论晴雨，不论人间是悲是喜，它总是那么流淌着。要能像它一样穿过草原，拂着杨柳，在细小晶莹的石子与沙子上面流过，无忧无虑，无可牵挂，自由自在，那多快活啊！

父亲的严酷要求，使得克利斯朵夫不得不让步了。每天早上三小时，晚上三小时，必须坐在琴凳上练琴，克利斯朵夫难过得大颗大颗的眼泪沿着鼻子和腮帮淌着。祖父见小孩子哭，就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为着人间最美最高尚的艺术，为着安慰苍生，为着人类增光的艺术而吃些苦是值得的。”克利斯朵夫听了非常感动。

一次，祖父带他到戏院观看歌剧演出，回家的路上，克利斯朵夫还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令人心荡神驰的境界。祖父说：“你瞧，做个音乐家多了不起！创造出这些奇妙的场面，不是最大的光荣吗？那简直跟上帝下凡一样。”祖父的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不久，这出歌剧的作者法朗梭阿·玛丽·哈斯莱光临这座小城，他将亲自主持他的剧本演出，并担任乐队指挥。这位德国青年音乐家的到来，使全城都轰动了。克利斯朵夫看过演出之后，亲眼目睹了观众像潮水一般拥向舞台，争着同音乐家握手的动人场面非常激动。克利斯朵夫还被祖父带到哈斯莱面前，他们进行了极为亲切、热烈的会晤。哈斯莱还说，当克利斯朵夫当上了音乐家的时候，要去柏林看他——哈斯莱，克利斯朵夫快乐得有点飘飘然了。他立志“创作如哈斯莱那样的作品，成为一个大人物。”

六岁的孩子开始了音乐创作。其实，克利斯朵夫在过去已不知不觉地作过不少曲了。只要是颤抖的，震荡的，跳动的东西，如大太阳的夏天，暴风的夜晚，流动的光线，闪耀的星辰，急骤的雷雨、鸟语、虫鸣，树木的呜咽，可爱或可厌的人声，家里发出的各种声音，咿咿呀呀的门声，血管里奔流的血液等等，世界上的一切在克利斯朵夫听来都是音乐，在他幼小的心中都有回响。像所有的儿童一样，他一天到晚哼个不停，他把日常生活，如洗脸、端汤、擦地板、三兄弟一起行走等等编成各种不同的音乐。祖父暗暗地留心积累克利斯朵夫在钢琴上弹出的各种曲调，然后整理汇编成各种曲调的乐谱，并且在这本乐谱的封面上用美丽的字体写着：《童年遣兴：咏叹调，小步舞曲，圆舞曲，进行曲》，并署上“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作品第一号”。克利斯朵夫见到自己的曲谱快乐得什么似的，他觉得路上的石子都在他周围跳舞，他仿佛听到一个骄傲的声音在心中叫着：“我是一个作曲家，一个大作曲家。”

祖父将克利斯朵夫音乐方面的秉赋给予细心的培植的同时，也将怎样做一个人出人头地的英雄人物的思想灌输给克利斯朵夫。在克利斯朵夫性格成长的过程中起着相反影响的，是克利斯朵夫的舅父。祖父仰慕大人物，要他成个大人物，舅父崇尚自然，以真诚的普通人自许。

克利斯朵夫的舅舅名叫高脱弗烈特，他和他妹妹一样的矮小，瘦弱，有点驼背，四十岁左右，脸上全是皱褶，粉红的肤色，和善的淡蓝色眼睛，头上总是戴着他那顶破旧的鸭舌帽。他是个走街串巷的小贩，一年四季出没于村舍之间，他和他妹妹都是谦抑、退让、被生活压倒的人。克拉夫脱父子瞧不起他，他好似毫无知觉一样地敬重他们，这使克拉夫脱父子心软了。他的心地很好，不管他怎样穷，他每次到来总是想办法给每人送一样小东西。他会唱很多古老的歌谣。他的歌声十分动人，又慢，又简单，又天真，歌声用严肃的、凄凉的、单调的节奏前进，从容不迫，间以长久的休止，然后又继续向前，逍遥自在，慢慢地消失在大气中。有一次在河边，克利斯朵夫听得凝神屏气，不敢动弹。一曲终了，克利斯朵夫要求舅舅再唱一曲，高脱弗烈特说：“我们需要唱的时候，不能不唱的时候才唱，不是唱着玩儿。”还

说：“歌是编不出来的。”他对克利斯朵夫说：“你想编些歌，为的要做个大人物；你想做个大人物，为的要编些歌。你倒像一条狗追着自己的尾巴打圈儿。”他还告诉克利斯朵夫，为写作而写作，为了要做一个大音乐家而写作，为教人家佩服而写作，这样的歌是不能打动人的。他还说：“音乐要谦虚，真诚。……在屋子里写的那些，全不是音乐，屋子里的音乐好比屋子里的太阳，音乐是在外边的。”舅舅的文艺观是朴素的，是为生活而艺术的观点，它同克拉夫脱父子为艺术而艺术，为出人头地而艺术的观点完全不同。

舅舅作为一个普通的底层人给克利斯朵夫性格的形成以朴素的民主的思想影响。好多年过去了，克利斯朵夫始终忘不了舅舅，他在进行音乐创作时总想到舅舅会怎么说呢？他如果想到舅舅会不喜欢的，就立刻把写的东西撕掉。只要舅舅说一声：“嗯，还不太难听……我喜欢这个……”他就高兴极了。

克拉夫脱父子看到克利斯朵夫在音乐方面显示的才气，心中有说不出的欣喜。他们把克利斯朵夫的《童年遣兴》题献给雷沃博大公爵殿下，公爵批准了专为克利斯朵夫组织的音乐演奏会。克利斯朵夫在音乐会上演奏得很成功，公爵称赞他是“再世的莫扎特”，还送给他一块金表，不过克利斯朵夫把金表掉在地上摔坏了。公爵的女儿把他抱在膝上，克利斯朵夫要公主保密，说乐曲中最好听的一节《特里奥》是祖父作的。公主大声宣泄出去了，于是克利斯朵夫沉着脸，瞧不起她，因为她说话不算数。公主送给他一匣精美的糖果，他心里在想：一个背信弃义的人的礼物该不该收下呢？

三年过去，克利斯朵夫快满十一岁了，他继续接受音乐方面的教育，他向博学的风琴师学“和声学”。这一年，他被公爵任命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他开始挣钱维持家用。此时克利斯朵夫的父亲酗酒更加严重，祖父越来越老态龙钟，他觉察到家里凄惨的景况，他显得少年老成并心事重重。大公爵常常召他进府去为贵宾们演奏，克利斯朵夫发现人们把他当作大公爵豢养的珍禽异兽，觉得这是屈辱。有一次，他受不了有钱的商人丹奥陶的嘲笑，在饭桌上他对着丹奥陶的脸唾了一口，吓得一家人逼着他给丹奥陶下跪，他抗拒，独个儿跑到田野里呆了一夜。克利斯朵夫跟周围的一切不和，他感到孤独，惟一的安慰是高脱弗烈特舅舅的来访。他们俩常常在黄昏时到田野里去散步，有时他们还去找舅舅的朋友渔夫奚莱弥，他们乘坐他的小艇，在月光下的江上慢慢地荡出去。桨上滴下的水珠好似一组琶音，或是一连串的半音阶，一层乳白色的水汽在河面上颤动，群星在天空打着寒噤，大家相对无语。渐渐地，月亮隐到树林后面去了，万籁俱寂，扁舟在黑夜里荡漾，他们悄悄靠岸，下了地，小心翼翼地走回家。克利斯朵夫喜欢接近他的舅舅，然而克拉夫脱父子却责备他不爱惜身分，说他不该去结交市井小人。

不久，祖父中风去世，克利斯朵夫异常悲痛，几次哭得失去了知觉，他甚至对上帝挥舞拳头，事后虽然也感到害怕，向上帝祈祷，但他心里怀着一腔怒火。虽然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卑恭的话，暗中对那可怕的事和造成那可怕的事的妖魔似的主宰恨到了极点，一心只想反抗。他不屈服于命运，没有一点儿听天由命的性格，只知道低着头向“不可能”直撞过去。虽然撞得头破血流，虽然意识到自己不比敌人高强，但他还是不断地反抗斗争。他的生活就是对命运的残酷作着长期的斗争，因为他不愿忍受命运。

祖父的去世带来了家庭经济的进一步衰落，父亲因为摆脱了爷爷的管束，喝酒的嗜好更加严重了，教课的差事差不多已经完全丢了。克利斯朵夫

被提升为宫廷第一小提琴手，父亲由于缺席的次数越来越多，给爵府开除了。从此全家的生活重担全落在这个年仅十四岁的孩子身上，克利斯朵夫做了一家之主了。

克利斯朵夫在乐队里的薪水不够应付家用，只得到外面兼一些课。上完课，他就得奔赴戏院的预习会，常常来不及吃中饭就一直忙到傍晚戏院开演的时候。完场以后，爵府还要召他去弹一二个钟点的琴。每天半夜从爵府回来，他差不多快要累死了。双手滚烫，额头发热，饥肠辘辘，浑身是汗，外面下着大雪，或者是弥漫的大雾，他得穿过大半个城市才能到家，到家后差不多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只要一上床，瞌睡立刻使他进入梦乡。谋生的烦恼，职业的无聊，像牢笼一般把克利斯朵夫束缚得紧紧的，他每天只有一二个小时的自由。一个人的力量只能在严格的范围之内发挥，在这一点上，贫穷不但可以说是思想的导师，并且是风格的导师，克利斯朵夫往往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出内容最丰富的乐曲。

有一个星期天，喜爱他的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邀请他到乡间别墅去吃饭，他结识了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少年，名叫奥多·狄哀纳。这是一个富商的儿子。这个富家子弟穿着很讲究，谈吐之间显出他知道的东西很多，他对克利斯朵夫又非常敬仰，于是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心中洋溢着温情，为表白自己的忠实而发誓赌咒，实际是他们青春时期已开始的先兆。不久奥多进了大学，他们一生中曾经有过的几个月的友谊也就消失了。于是爱情开始扰乱克利斯朵夫的心了。

市参议官新寡的太太带着女儿回到莱茵河畔的小城来了，她们的住屋与克利斯朵夫家挨着。克利斯朵夫从顶楼上的卧室里可以看到克里赫太太家垂在墙外的沉重的树枝和瓦上生着藓苔的红色屋顶。园子右边有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爬上路旁的界石可以望见墙内的景致。有一次，他爬到界石上无意中见到了身穿孝服，仪容典雅，个子高大的少妇和她那十五岁的女儿。克里赫太太聘请克利斯朵夫教她女儿弥娜学钢琴，克利斯朵夫和弥娜之间很快产生了爱情。克里赫太太发觉后坚决予以阻拦，她毫不讳言地明说，凭着克利斯朵夫的金钱和门第决不可能娶到她的女儿。克利斯朵夫气愤地写了一封信给克里赫太太，信上宣称：“一切自命高贵而没有高贵心灵的人，我鄙薄她。”

正当克利斯朵夫经历着爱与恨的凶险难关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的父亲由于喝醉了酒掉在一个沟里淹死了。他从父亲临死时喊出“别瞧不起我！别瞧不起我！”的声音中，体会到父亲虚度一生的痛苦。他想到：“宁可受尽世界上的痛苦，受尽世界上的灾难，可千万不能到这个地步！”他看到人生是一场无休止的、无情的搏斗，凡是要做个够得上称为人的人，都得时时刻刻向无形的敌人作战：本能中那些致人于死命的力量，乱人心意的欲望，暧昧的念头，使你堕落使你自行毁灭的念头，都是生活的顽敌。他看到自己差点儿堕入深渊，也看到幸福与爱情只是一时的欺罔，为的是叫你精神解体，自暴自弃。于是他听见了他的上帝的声音：“往前啊，往前啊，永远不能停下来。”克利斯朵夫这时才十五岁。

祖父、父亲去世之后，家境越加困难，两个弟弟都出外自谋生计去了。为了减少经济上的开支，克利斯朵夫和母亲搬到更简陋的住所去居住。这是一些小公务员，小手工业者和一些小有产者的住区。房主人于莱是祖父的老朋友，于莱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于莱的外孙女洛莎是个老老实实的人，没有虚荣，不卖弄风情，非常热心，待人好而不需要回报。这些普通的人给克

克利斯朵夫的生命注入了民主主义思想的血液，使他在思想感情和生活作风上具有平民的特性。洛莎崇拜克利斯朵夫，甚至渴望得到他的爱情。可是，克利斯朵夫却爱上了院子对面开一个小针线铺的年轻寡妇萨皮纳。萨皮纳是个慵懒、苍白而病弱的女人。相貌长得很好看，细身材，小骨骼，动作老是懒洋洋的，穿戴并不讲究，有点不修边幅，但她青春的风韵，温和的气质，天真的娇媚，惹动了克利斯朵夫对她的怜爱，他们还一同到萨皮纳的哥哥家去给一个男孩行洗礼，回来之后遭到周围人们的敌意。克利斯朵夫正巧这时被人邀请到外地去举行音乐会，回来时得知萨皮纳患流感死了。克利斯朵夫伤心地觉得世界没有安排好，爱人家的得不到人家的爱，被人家爱的偏不爱人家，彼此相爱的又早晚得分离。

多雨的夏季过后，接着是晴朗的秋天，果园里的树枝上挂满了各种果实。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走下山坡遇见一个高大的黄头发姑娘。她是一家帽子铺的女店员，名叫阿达，是一个放荡成性的女人，她和克利斯朵夫在乡间小客店住了一晚上。小城里顿时议论纷纷，中产阶级把克利斯朵夫的行为批评得很厉害。为此，他丢掉了一部分家庭教课的差事，还有一部分家庭在克利斯朵夫上课时由母亲从旁监视。房主于莱一家对此表示深恶痛绝。阿达是个品德低下的女子，从来不用头脑，她所关心的只是吃喝玩乐，生活放荡不羁。谈吐庸俗不堪，她甚至叫克利斯朵夫丢掉音乐。她不懂音乐，恨音乐，后来她把克利斯朵夫抛弃了又勾搭上了他的弟弟恩斯德。这种乱伦的不道德的行为使克利斯朵夫不能容忍，觉得受了侮辱，为表示抗议，克利斯朵夫竟走了一段极端放荡的生活道路，他拚命喝酒。

有天晚上，克利斯朵夫从酒店出来，舅舅高脱弗烈特见到他，问他：“你好，曼希沃。”这使克利斯朵夫惊呆了。他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父亲的影子。他整夜地反省，他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已经产生了恶习，觉得十分厌恶。他发觉自从父亲去世后，一年来没有一天不是白白过去，没有写过一部有益的作品，没有转过一个有意义的念头，没有对任何一件事情做过一次持久的努力，有的只是一大堆混乱的欲念，这是自我毁灭。狂风，尘埃，虚无，……要做的事一件也没做到，所做的全是跟志愿相反的事。舅舅告诉他说：“人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志愿和生活是两件事情。别难过了，最要紧的是不要灰心，继续抱着你的志愿生活下去。其余的就不由我们作主了。”舅舅又说：“你得对未来抱着虔敬的心。别想什么一年、十年以后的事，你得想到今天。把你所有的欲念统统丢开，……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竭尽所能。”“英雄就是做他所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克利斯朵夫看着舅舅远去的身影，他想：“对，竭尽所能，能够做到这一步也不错了。”寒风凛冽，他迎着寒冷而明亮的阳光微笑着，他想：“我也会醒过来的。”他的确醒过来了。

克利斯朵夫挣脱了精神上的风暴感到自己独立不羁，完全自由，非常快乐。克利斯朵夫认识到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发出来。克利斯朵夫专心致志体验着创作灵感的乐趣，眼中见到的，耳中听到的，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一瞥一视，片言只语，都可以在心中触发一些梦境。在他那浩无边际的思想天地中，布满着千千万万的明星。然而即使灵感在目前还没有枯竭的危险，克利斯朵夫也已经明白，单靠灵感是永远构思不出一整部作品的。某种思想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很凌乱的、很粗糙的，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它们往往是断断续续，忽

起忽落的，必须赋予智慧和意志，才能锻炼出新生命。他在市音乐厅的某次音乐会上看到了德国艺术的虚伪性，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无聊的，所有的艺术家都婆婆妈妈，沾沾自喜的。像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舒曼以及浮夸感伤的歌曲的小作家，完全是沙土，没有一块岩石。克利斯朵夫感到这一切太荒唐、太幼稚了，克利斯朵夫把听众与作品轮流打量一番，暗自忍俊不禁，等到合唱班唱起少女羞怯的“自白”，他抑止不住，竟自大声地笑起来。立刻从四下里响起一片愤怒的嘘声，有的大喊“滚出去！”从此克利斯朵夫遭到城里人们的反对，大公爵也说他：“听你的话，先生，有时人家竟会疑心你不是德国人。”克利斯朵夫处在四面楚歌之中。

自从克利斯朵夫看出了德国社会的虚伪，看到了德国人普遍不愿看到事情的真相之后，他决定表露自己的真诚，演奏自己的作品。然而在一次音乐会上，他碰到的第一个大钉子是公爵不到场，三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接着是歌唱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唱了起来，还没等终场，克利斯朵夫早把琴关上了。这次音乐会，克利斯朵夫得到的是冷淡和嘘声，他灰心到极点。有的人把他早年的作品拿来和新作相比较，说他的新作不行。克利斯朵夫气得大叫起来，他反对别人要他一辈子做小孩，他认为童年的作品所以有意思，并非由于它幼稚无聊，而是由于他感觉出有股前程无量的力量潜伏在那里。他要人家了解现在的他，他妄图使人家了解他，他替自己作说明，跟人家辩论，他自信心很强，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刷一番，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克利斯朵夫对戏院里的同事发表了许多“怪论”，他们对他放肆的言论都不大乐意听，惟独弗朗兹·曼海姆在一旁恭维他，其实曼海姆故意发表怪论，他见克利斯朵夫拿他的话当真，觉得好笑。他要克利斯朵夫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在他们几个犹太青年办的绝对自由的杂志上发表。实际上这是一伙纨绔子弟，他们把文学当成消闲取乐的玩意儿。克利斯朵夫在他们当中感到很不舒服，由于曼海姆的做戏，克利斯朵夫误认为他比其余的人要可爱一些。曼海姆把克利斯朵夫请到自己的家里来吃饭。于是，克利斯朵夫见到了银行家洛太·曼海姆和他的女儿于第斯。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克利斯朵夫对犹太人没有什么成见，但他从来也没有跟一个犹太人有过什么亲密的关系，他到曼海姆家去了几次以后也就不再去了。

在杂志上刊登文章，最初一切都很顺利。克利斯朵夫在上面发表了一些音乐评论，其中有一篇题目叫做：《音乐太多了！》，他攻击了那些不论好坏都同样拍手喝采的人。接着，他又写文章攻击乐队指挥，说他小心谨慎，不敢把新作排入节目；他还对“马戏班骑师”式的名指挥进行指责，说他们把尽人皆知的作品弄得面目全非；他嘲弄钢琴演奏家们机械的练习是属于工艺学院的范围的；他批评歌唱家态度粗俗，服装难看，歌唱得不自然……

克利斯朵夫指责了艺术家之后，又对舞台下的市民群众教训一番，认为他们对一切都拍手叫好，这就是一个罪过。

克利斯朵夫并不就此罢休，他像一颗炮弹似地去轰击批评界了。结果批评界把他当作国民的公敌，对他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们把他的言论改头换面，弄得荒谬绝伦，还披露他的轶闻隐私，但其中一大半是凭空捏造的，编得可非常巧妙，还挑拨克利斯朵夫同宫廷方面的感情，他们还攻击他的外表、面貌、服装。曼海姆看见克利斯朵夫被人奚落笑弯了腰。曼海姆还偷着删改克利斯朵夫的文章。有一次，曼海姆把父亲送给朋友的包厢票给了克利斯朵夫。

夫，克利斯朵夫将一张票给了一个想看法国剧，但又没买到票的身穿朴素衣裳的法国姑娘。舞台上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克利斯朵夫一向是把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的灵泉。他看到一个著名女演员竟反串哈姆莱特王子，他对这种违反自然的现象十分气愤，但被那个演莪菲利亚的不知名姓的女演员吸引住了，第二天他去拜访了她。她的艺名叫高丽纳，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南方女子。她有健美的身体，快活的性格，敏锐的理解力，开扩的胸怀。她同他谈到巴黎。据她说，在巴黎谁都是自由的，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信什么就信什么，绝没人干预旁人的信仰，文人也不相轻，也不互相标榜自己，批评界绝不压制无名的天才，绝不一味吹捧成名的作家。人们都那么温厚，那么亲切，那么诚恳。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点儿不痛快。新来的客人，不管是谁，只要真有价值，可以十拿九稳地受到人们的欢迎，摆在他们面前的尽是康庄大道。克利斯朵夫听着，连嘴都合不拢了。不久高丽纳跟随戏班到别的地方演出去了，克利斯朵夫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在他乘坐火车回家的途中隔窗望见了那个他曾经给过戏票的法国姑娘，但很快又在黑夜中消失了。过了好久，他才从旁人的口中知道，就是由于他们一同看过戏，那个叫安多纳德·耶南的姑娘被她的犹太主人辞去教师工作。克利斯朵夫对此感到难过极了。

有一个颓废派诗人写出了一出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诗剧《伊芙琴尼亚》，周围的人都说是杰作，劝说克利斯朵夫为这个剧本配乐。克利斯朵夫为它配了乐，但也看出了剧本十分荒谬，大为沮丧。演出这个剧本的前两天，他和杂志社的人又闹翻了。

《伊芙琴尼亚》公演失败了，杂志吹捧了剧本，但对音乐却只字未提，而别的刊物则大喝倒采。这时克利斯朵夫写了一篇回击文章送到社会党的报纸上刊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并不信仰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者说来说去离不开马克思，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兴趣，他之所以向社会党的报纸投稿，不是因为他信仰了社会主义，而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报刊都不愿意登他的文章。

由于克利斯朵夫的文章在社会党的报纸上发表了，大公爵对他大发雷霆。克利斯朵夫回敬说：“我不是你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甚至伸出拳头要去打公爵的脸。他被公爵从宫廷乐队里开除了。

克利斯朵夫失去了宫廷这个靠山，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他寄给法兰克福市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曲被毫无理由否决了；科隆市的乐队预约的一阕序曲，也给退回来了；更为难堪的侮辱是，某音乐团体的指挥于弗拉脱，他伪装愿意演奏克利斯朵夫的作品，但故意奏错音符，发出极不协调的荒谬绝伦的声音，听众忍俊不禁，有的甚至捧腹大笑起来。克利斯朵夫愤慨万分。他想：“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心中隐藏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想即使别人不能欣赏，至少也得感激他的好意，至少也可以用友好的态度指出他错误的地方；可他们竟怀着恶意取笑他，故意歪曲他的思想，把他踩在脚下，要置他于死地，这真是从何说起呢！他嚎啕大哭，甚至产生了投河自杀的念头。他站在河岸边，俯瞰着清澈恬静的河水感到困惑的时候，听着小鸟的歌唱，河水的喁语，望着麦秆在微风中波动，白杨萧萧……这一幅生动的春回大地的景象又把他从死亡的边缘上呼唤了回来。他想到：“为什么自然界这样的美，而他们（人类）那样的丑？”不管它吧，

他觉得自己永远是热爱生活的。

克利斯朵夫鼓起勇气重新工作，他埋头写作，但找不到一处地方答应印刷他的作品，他只好自己出钱印刷。一册厚厚的乐谱印出来了，但六个月中连一部也没卖掉。克利斯朵夫负债了，只得接受母亲鲁意莎的帮助。克利斯朵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教课的位置，结识了一对和善的夫妇。可没想到竟有人暗中写匿名信致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僵，那么难堪。最后克利斯朵夫只好和他们分手了。

克利斯朵夫十分孤独，连他的舅舅高脱弗烈特也被死神吞没了。他在挣扎之中，忽然想起儿童时代曾经那么爱慕过的音乐家哈斯莱。他相信哈斯莱能够救助他。他告诉母亲出门一星期，当夜搭火车往哈斯莱所在的德国北部的一个大城市去了。哈斯莱已经享有盛名，他那软弱的性格，使他经不起生活中出现的好运和厄运，太热与太冷他都受不了。他过着冷漠、忧郁而又平凡的生活：好吃好喝，无所事事，有时悲观、厌世，心绪恶劣。从前曾引起他的热情或厌恶的东西，现在他都漠不关心了。因此当克利斯朵夫满怀热忱专程来拜访他的时候，他完全无动于衷，冷冷地把他送到大门口，没有一句挽留他或约他再来的话。

克利斯朵夫离开哈斯莱之后失魂落魄地来到车站，陡地想起一位陌生的朋友苏兹，克利斯朵夫为了寻找同情和安慰，便决定去拜访他。这位已经七十五岁的、教美学兼音乐史的大学教授对克利斯朵夫的到来表示了真诚的欢迎，他见到克利斯朵夫快活极了。克利斯朵夫弹奏曲子时，挂钟里的鹧鸪叫了起来，苏兹想亲自把这煞风景的东西摘下来，差点摔了跤。他叫女仆把钟拿出去随便怎么处理都行，只要从此不再看见它。克利斯朵夫立刻感觉到这颗心是多么善良、纯朴。他觉得遇到了真正的朋友，自己又活过来了。他把苏兹和哈斯莱作了比较，一个又老又病，可是他精神多么活跃！一个又年轻又有名气，可是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愿知道！克利斯朵夫所知道的现代艺术潮流，苏兹不但全部熟悉，而且还知道无数的关于古代与外国的音乐家的事情。他们在一起愉快地相处了一天以后就分手了。不久，苏兹去世的消息传来，克利斯朵夫还悄悄地哭了一场。

小城市的闭塞、偏狭使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他想离开德国，但又怕母亲难过，鲁意莎老了，儿子是她惟一的安慰，她怕儿子提到走的事。有一天傍晚，克利斯朵夫到城外去散步。那天正是农村里的一个节日，农村的青年男女正在跳舞，这时突然闯进十几个大兵，班长看上了漂亮的洛金，他堵住她，由于洛金拚死反抗，大兵班长打了洛金一个嘴巴。这时克利斯朵夫见义勇为，给了大兵班长一顿好打，村民们也跟着发泄他们的怨愤，打跑了那些强盗兵，还打死了一个人。乱子闯大了，克利斯朵夫被村民们保护着偷跑出国境，他乘着列车向巴黎的方向奔驰。

克利斯朵夫来到巴黎，人地生疏。巴黎的现实世界和他理想中的巴黎相去甚远。他去找少年时期的朋友奥多·狄哀纳。狄哀纳是一片布店的经理，可他躲着克利斯朵夫，避而不见。无奈见到了，他也百般推脱，不愿帮助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气得发昏，只好去找一个在书店做事的犹太人西尔伐·高恩。但高恩只是表面应酬，不给他实际的帮忙。还是老板娘同情他，把他介绍到肉店老板家去教他的女儿弹钢琴。高恩让他认识了一些侨民青年，他跟他们参加了许多次音乐会。然而，演奏的都是同样的曲子，他看到文坛上“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卖淫的艺术到处泛滥”，舞台上

“可以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刺激一下文明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现象，都无不具备。”而批评家不过是些给主子尽“奴仆的责任”的十足的奴才。克利斯朵夫批评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艺术家说：“你们都是虚伪的家伙。为艺术而艺术！……喝！多么堂皇、多么庄严的信仰！但信仰只是强者才有的。艺术吗？艺术得抓住生命，像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般，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可怜你们是些麻雀，找到什么枯骨便当场撕扯，还要噉噉喳喳地你争我夺。不用说，艺术是一种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艰苦的奋斗才能换来，等到‘力’高歌胜利的时候才有资格得到艺术的桂冠。你们用你们的畸形怪状来制造文学。你们沾沾自喜地培养你们民族的病态，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恶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推进鸦片烟馆。”克利斯朵夫指责法国艺术界的虚伪、腐朽，也奇怪法国的批评界人数那么多，但是丝毫不起作用。

克利斯朵夫指出，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然而批评家自己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是溷浊，还是清新。除此之外，他们彼此又都是熟人，是一个集团的人，因此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孤立的人，要独立自主，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就是最优秀的人也在怀疑、思考，为了坦率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像地狱一样呢？谁敢揭穿走红运的人的庸俗与无赖呢！谁又肯为孤立无助的无名艺人辩护！克利斯朵夫大声说，法国需要大批评家，莱辛，布瓦洛。

克利斯朵夫在闻名巴黎之前只好找一些教课的差事来糊口。他的女学生中有一个名叫高兰德·史丹芬的，她的父亲是个有钱的汽车制造商。和高兰德一起学钢琴的，还有一个年纪不满十四岁的少女，她是高兰德的表妹，名叫葛拉齐亚·蒲翁旦比。葛拉齐亚有一张宽大的脸庞，沉静而美丽的眼睛，是意大利人，差不多是在平原、草场和小河边长大的，她对克利斯朵夫充满柔情，而克利斯朵夫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朴实的少女的感情。当克利斯朵夫厌烦了高兰德的社交圈子，不再上她家去之后，葛拉齐亚写信叫爸爸把自己接回乡下去了。

克利斯朵夫有一次在高兰德家偶然认识了社会党议员亚希·罗孙，他热心支持克利斯朵夫把新创作的《大卫》拿到戏院去上演。演出之前克利斯朵夫坚持换掉演大卫的女演员，罗孙的表情由满面笑容而变为冷若冰霜。原来克利斯朵夫坚持换掉的女演员是罗孙的情妇。从此，他跟罗孙一伙人完全决裂了，于是他又陷入孤独之中。

克利斯朵夫又经历了一个艰难时期。他惟一的收入就是教一个四十岁的工程师学拉提琴，教钢琴课的几处差事都丢了。他只好搬进一间阁楼去住，每天只在下午一点钟吃一顿饭。他找不到工作，被生活逼迫得无路可走，最后找到一个改编乐谱的工作。寒冬来临，克利斯朵夫又冷又累又饿，他发着

布瓦洛（1636—1711）法国古典派诗人兼文艺批评家，在法国文学史上以态度严正著称。

大卫，《圣经》里的人物，传说在公元前一五五年至一一四年为以色列国王，年幼为父牧羊，长大后继承扫罗王的王位。

高热，病得昏昏沉沉，全靠帮佣的女工西杜妮照顾，而西杜妮由于克利斯朵夫对她太亲热，被她的主人解雇了。

冬季很长，克利斯朵夫的病虽然大有好转，但还没痊愈，右边的肺老是一处地方隐隐作痛。他虽然受着孤独、贫病和种种苦难的煎熬，但他还是耐心地忍受着命运的折磨，他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过。他天性中那股强大而又有点畸形的生命力开始后退了，他再也不恨什么，再也不去想恼人的事了，即使想到，也不过耸耸肩膀；他对自己的痛苦想得比较少，而对别人的不幸想得比较多了。从西杜妮的身上他联想到地球上那些默默地受着苦难煎熬的灵魂就想说：“你们，我并不认识但却爱着的人，我祝愿你们幸福。”一天傍晚，克利斯朵夫在旧书摊上无意中读到了有关圣女贞德的历史故事书，克利斯朵夫佩服她兼有男性的刚强和女性的温柔，尤其使他感动的是贞德的慈悲心。“她在最激烈的厮杀中还是温柔的，对最坏的人也是善良的，便是在战争中也是和平的。战争是表示魔鬼得胜，可是在战争中间，她有上帝的精神。”克利斯朵夫看到书上这些话，就想到自己：“我厮杀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上帝的精神。”克利斯朵夫把传记家笔下的话重复念着：“不论别人如何蛮横，命运如何残酷，你还得抱着善心……不论是如何激烈的争执，你也得保持温情与好意，不能因人生的磨难而损害你这个内心的财宝。”

这明明是传记作者米希莱在进行以慈悲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说教，克利斯朵夫却相信了。克利斯朵夫责备自己说：“我真罪过，我不够慈悲，我缺少善意，我太严峻，请大家原谅我吧！我是希望你们幸福的！”

克利斯朵夫受到书的启发，产生过这样想法，但当他一接触到那些令人生厌的人，他的怨恨又复苏了。

正当他无声无息离群索居的时候，罗孙太太送来了一个请柬，约他去参加一个音乐夜总会。克利斯朵夫在这个音乐会上认识了一个名叫奥里维·耶南的青年。他是一个破了产的银行家的儿子，曾和克利斯朵夫一道看戏的那个法国姑娘——女教师安多纳德·耶南就是他的姐姐。姐姐比他大五岁。父亲破产自杀，母亲忧虑而死，姐弟二人经历了人世间的巨大变迁，体验了世态的炎凉，无所依靠的姐弟二人在茫茫人海中相依为命。安多纳德历尽辛苦，用教书的微薄收入将弟弟供养到中学毕业。尽管安多纳德茹苦含辛，她还是送弟弟去考高师，可是由于奥里维胆小得近乎病态，应付考试的能力越来越低，尽管他平时学习成绩优秀，大学考试还是落选了。姐姐为了多一些收入，到德国教书来了。姐弟俩几乎每天通一次信，安多纳德被解聘之后回到巴黎，奥里维正在病中，他们赶紧租了一间公寓住下，在姐姐的护理下，奥里维很快恢复了健康，考试揭晓了，这次奥里维被录取了，姐弟俩高兴得在父母的遗像前哭了起来。奥里维进了高师，有三年的公费，毕业后还有职业的保障，他们用一点微薄的积蓄到瑞士旅行去了，不料安多纳德病倒了，回国后不久便去世了。

奥里维早就因为欣赏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才能而喜欢克利斯朵夫了。当他从信件中知道克利斯朵夫同他姐姐在德国碰过面，并且对他姐姐很友好的时候，他对克利斯朵夫更是说不出的喜爱。两人在这次音乐会上邂逅相逢，一见如故，感情十分融洽。但两人的气质完全不同，一个是浪漫派，一个是现实派，一个富于幻想，一个要求行动。克利斯朵夫主张法国人应“团结起来

贞德（1412—1431）是十五世纪英法百年战争中挽救法国于危亡之中的女英雄，后来遭到敌人杀害。

打扫房子”，不能让少数坏蛋把人们踩在脚下，不要等拿破仑再世，才去改造世界。而奥里维则说：“暴力是我们所厌恶的”，他相信法国“潜在的德性，光明与理想主义的力量”，他认为自由的乐趣是别人所无法知道的，值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奥里维的自由具有空想的性质，他向往的是抽象的自由，绝对的自由，他渴望自己周围所有的人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在内。他认为安全，秩序，完满的纪律都不相干。克利斯朵夫认为“世界是需要规律的”。克利斯朵夫不能赞同奥里维的宿命论，他恨不得唤起整个民族的健全的“力”，使全法国的老实人都奋臂而起。现在他从奥里维的身上，把他过去对法国的看法推翻了。站在他面前的不再是那个快乐，随和，无忧无虑，光芒四射的民族，而是一批含蓄的、孤独的人。他们表面上像蒙着一层明晃晃的水雾，颇有乐观的色彩，其实却浸透了深刻而沉闷的悲观气氛。他们脑子里全是执着的念头，这都是一些不可动摇的灵魂。克利斯朵夫不明白，这种信心与坚忍刻苦的精神是从哪儿来的。奥里维说：“从失败中得来的……我们丧权辱国（指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跟死神照了面，暴力的威胁老是压在我们身上。法国的孩子，人家教养他们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报仇雪耻。虽然他们年纪很小，但早已懂得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只有强权！这个发现，使一些人自暴自弃，只图享乐；另一些人则是奋发图强，任何幻灭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奥里维对克利斯朵夫说：“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你们德国给了我们多少痛苦！”“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是灾难之子。”

两人的境况很苦，差不多没有固定的收入。克利斯朵夫替人抄谱和改编乐曲，奥里维放弃教职，从事写作，但要发表一些东西简直不可能。在艰难的境遇中，惟一来帮助他们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犹太人，名叫泰台·莫克。他替他们向有钱的考古学家求援，居然为奥里维弄到了一笔学士院的奖金。两个朋友性格上的不同，有时发生龃龉，但很快就和好了。可是却有人从中挑拨离间散播不和，由于有人对克利斯朵夫的讥讽，激起克利斯朵夫的恼怒，引起决斗，幸好双方子弹都没击中对方。

两个朋友的友谊恢复了，这时克利斯朵夫觉得内心充实，精神愉快。这种快乐与旺盛的生命力感染了他周围的人。他和公寓的盖房工人交上了朋友；住在楼上的工程师本来已经厌倦了研究工作，由于克利斯朵夫的影响，又提高了对本行的兴趣；住在三楼上的一对夫妇经常和克利斯朵夫讨论音乐，言谈中表现出一股朝气。奥里维说得对，他说：“倘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种艺术叫做法国艺术，另外一种叫做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和一种没钱人的艺术。”克利斯朵夫对法国人愈了解，愈觉得法国的老实人和德国的老实人没有多大分别。他觉得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当因种族不同而在精神上分疆划界，在同一种族之内，老实人也不应当为了思想不同而分什么畛域。他怀着这种心情，结识了住在公寓里的高尔乃伊神甫和华德莱先生，还结识了一位退役的军官，他谈了一些法国殖民军的情况。从军官口里，克利斯朵夫听到了法国出征非洲的经过，真是充满了血腥味的野蛮行为。克利斯朵夫从中看到了一批现代冒险家的狰狞面貌。他从军官口中还知道了法国的军队无所不为，他们把战争变成哲学问题，谈论不休，废话连篇。更为可怖的是，特务使军官们互相猜忌；政客们下达一些专横的命令；军队不得不干些警察的工作，还清理教堂，弹压罢工，这一切又被当权的政党用来争权夺利。这个退

役老军人十分讨厌那个殖民地部队。

一个人对于别人的影响，决非靠言语能完成，而是靠精神来完成的。住在公寓四楼上的奚尔曼太太，一个死了丈夫和孩子的寡妇，枯涸的生命在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影响下居然有了生气，收养了一个死了养父的孤女。

克利斯朵夫做着人类大团结的美梦，他想：“要那些不愿意相识的，信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好人携起手来，难道就不可能吗？”

他希望出现人和人之间和谐的太平盛世。然而德国和法国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德国蛮横无理地向法国下了最后通牒，这种野蛮的压迫使法兰西沉沉酣睡的傲气被惊醒了，举国上下都沸腾起来，连最麻木的人也气得直嚷嚷。当然德国的民众同这些挑衅行为完全不相干。这件事对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然而战争的阴影，很快就过去了，局势有了缓和。

克利斯朵夫用十倍的兴致重新埋头创作，奥里维也受他的影响。他们两人根据文艺复兴时期伟大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合作写一部史诗，唯物主义色彩非常浓厚，除了原有的几个角色之外，还增加了一个叫做忍耐的乡下人，他天真，狡猾，被人殴打，盗窃，什么对他都无所谓。他受着主子的剥削，挨着他们的鞭子，心里老是想着：“事情不会老是这样的。”克利斯朵夫根据这篇诗歌写成几部交响曲，克利斯朵夫写成一支曲，奥里维立刻写出这支曲的歌词。他们分享着创作的欢乐。音乐出版社将克利斯朵夫的《大卫》付印了，在国外产生很大的反响，这部作品在英国受到欢迎，德国也演奏了这部作品。甚至曾经遭到喝倒彩的《伊芙琴尼亚》在德国又引起重视。人们都说克利斯朵夫是个天才，德国也称他是大音乐家，未完成的《拉伯雷史诗》已被预约了，连当年侮辱过《大卫》的人也说起它的好话来了。这次成功来得太快，也太意外，使克利斯朵夫不得不存着戒心。

正当他为自己的成功欣喜的时候，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了。克利斯朵夫不顾一切地回到离开多年的故乡。他推门进去，母亲孤零零地躺着，没有一个人在她身边，一个兄弟在汉堡，另一个在美洲。克利斯朵夫赶到时，鲁意莎满脸是泪痕，颤抖地握着儿子的手，不胜怜爱地望着儿子，溘然长逝了。

当天晚上，奥里维赶到了，由于对克利斯朵夫的通缉令尚未撤销，为了逃避逮捕，奥里维送走了克利斯朵夫，他自己留下安排好事后，在法国边界与克利斯朵夫相会，然后他们一同回到巴黎。

没料想巴黎的《大日报》竟登了一篇宣传克利斯朵夫是天才音乐家的文章。由此引来了数不清的记者轮番地采访，他们肆意夸张，胡编乱造，说他是共和派艺术家，说他对祖国有卑鄙的仇恨心，还说他穷途末路时弹着吉他沿街卖唱……克利斯朵夫被这些长舌妇的胡说八道搅得厌烦透了。但从此，克利斯朵夫却出了名。

这个时候，克利斯朵夫认识了一个富有的工程师的女儿雅葛丽纳·朗依哀，她是一个清瘦，妩媚，性格开朗，有着淡黄色的头发，脖子又长又细，身材细小而苗条的少女。克利斯朵夫很爱她，当他发现他的好友奥里维也在爱着她的时候，克利斯朵夫主动退出来了。并且像母亲似地照拂奥里维，留心他的修饰，替他打领带，还为奥里维出谋献策。不久，奥里维和雅葛丽纳结婚了，他们到意大利旅行去了。克利斯朵夫常常写信给奥里维，他觉得自己孤独得很。他想起歌德的一句话：“一个作家凭着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大众就设法不让他产生第二部有价值的作品。”因此，他闭门谢客，不想见到什么人，只有一个名叫赛西尔·弗洛梨的矮胖姑娘同他往

来。她为人笃实，温柔，曾获得国立音乐学院钢琴头奖。有一次克利斯朵夫看了她的表演，大为赞赏，以后他经常去看她，他们彼此真诚相爱了。

不久，克利斯朵夫又认识了一批新的陌生的朋友，他的艺术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得更宽广，更富于人情味。他不再希望音乐只是一种独白，只是自己的语言，更不希望它只是内行人能理解的比较高深的艺术。他要让音乐成为人类沟通思想的桥梁。克利斯朵夫写信给居住在外省的奥里维（这时奥里维在法国西部一个城里任中学教员），要他搜集优美的民间诗歌。而奥里维此时正陶醉在新婚的幸福中，只知有爱情。起初奥里维还用诗歌来表露自己的感情，后来连这个也嫌侵占了爱情的时间。这种狭隘的个人的幸福变成了生活的惟一目标之后，生活也就变得没有目标了。奥里维尝到了这种安乐生活的烦闷，内心感到空虚、无聊，雅葛丽纳也厌倦了她的婚后生活。她父亲托人把女婿调到巴黎。他们回到巴黎的最初几个月是快乐的。但渐渐地，雅葛丽纳身上的诗意消失了，而奥里维也辞掉了自己的教职，专事写作。由于他失去了和那些不怕艰苦，披荆斩棘的人们的接触，他的信念也不像从前那样坚定了。雅葛丽纳慢慢也觉得丈夫没有成名对她是种屈辱。她认为奥里维既不十分聪明，也没多大才气，她感到生活窒息得很。雅葛丽纳喜欢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但她绝对不会去爱克利斯朵夫，只不过想把两个友谊破裂的男人一齐抓到手而已。这时克利斯朵夫和交红运的女演员的恋爱已经传遍巴黎，因此，她对克利斯朵夫产生了一种好奇心，想要试一试她的魅力。克利斯朵夫发觉了她的意图之后，断然收拾行装走掉了。

克利斯朵夫曾经写信给托尔斯泰，他对他的著作十分钦佩，想把他的一个通俗的短篇谱成曲，还把自己的歌集寄给了他，可是托尔斯泰没有回复他，他完全听不懂克利斯朵夫的音乐，就像他认为贝多芬是颓废派，莎士比亚是走江湖的一样。克利斯朵夫气恼地说，大人物是用不着我们的，我们应该想到另一些人。克利斯朵夫得罪了吹捧他的《大日报》，他们搬用了各种武器来攻击他。由于出版社篡改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他要以五十倍于原价的代价买回他的全部作品，正当他卖掉一切也凑不足钱数的时候，奥国大使馆决定在庆祝会上演奏他的曲子，并给了他一张回国护照。于是克利斯朵夫又一次回到了故乡，除了母亲坟头上的草长得很高之外，小城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朦胧的月儿从云端里走出来，河上闪出粼粼的银光。克利斯朵夫告别了在阴影中沉睡的古城后乘坐火车离开了故乡。

奥里维和雅葛丽纳的爱情并没有因为有了一个孩子而破镜重圆，他们有时一连好几天不说话，令人窒息的静默使他们的感情破裂得更快了。奥里维将心中的悲伤对克利斯朵夫的女友赛西尔·弗洛梨说了，并且把自己的感受写了下来。不料那些诉说衷肠的信被雅葛丽纳看见了，她的心完全冷了。她抛弃了丈夫和新出世不久的儿子同巴黎的一个走红运的作家私奔了。那个作家是风月场中的老手，人并不年轻，臃肿笨拙，牙齿都坏了，但他却糟蹋了一大批女性，甚至有的新婚少妇也飞蛾扑火自取灭亡。雅葛丽纳对这一切都是知道的，她是自作自受自投罗网。奥里维被雅葛丽纳遗弃后回到克利斯朵夫身边，孩子只得交给女歌唱家赛西尔抚养。

克利斯朵夫在一次奥国举行的晚会上见到了过去的学生葛拉齐亚。二十二岁的葛拉齐亚一年前嫁给了奥国大使馆的青年随员。这位随员是奥国首相的亲戚，葛拉齐亚在巴黎已成了引人注目的少妇。她是一个极有理性而全无荒唐幻想的女性。她对克利斯朵夫很关心，她使巴黎的报界停止了对克利斯

朵夫的攻击；大使馆举行的这个音乐演奏会也是她促成的；克利斯朵夫获得回国探亲两日的通行证，也是她暗中周旋的。克利斯朵夫对她十分感激。以前葛拉齐亚曾爱过克利斯朵夫，但他完全没注意到。如今克利斯朵夫爱着葛拉齐亚，但葛拉齐亚只能给他一点友谊，她爱着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了驻美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葛拉齐亚随同丈夫一起到美国去了。

克利斯朵夫想，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并不在于信仰的有无。同样，结婚与不结婚的女子的苦乐，也并不在于儿女的有无。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是一颗歌唱的心的和声，而灵魂的最美的音乐是慈悲。克利斯朵夫唱起了自己向来所反对的勃拉姆斯的一支歌，表示了对谁都应当宽恕的一种精神。

克利斯朵夫的心绪平静得很。挪威的戏剧家易卜生说过：“在艺术中应当坚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气，还有充实人生而使人生富有意义的热情与痛苦。否则你就不能创造，只能写些书罢了。”克利斯朵夫就是在写书。书固然写得很美，但他却宁愿它们减少一些美而多一些生气。

奥里维在平民区租了一个很朴素的公寓，里面住了不少雇员和工人的家庭。有一天有个工人家庭，一家七口全自杀了，奥里维心里非常难受，他把这事告诉了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听后动了感情。他很想用艺术去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欢乐。奥里维感到所有被压迫的人们的呼号已经震动了他的耳鼓，于是他先从帮助穷人入手。他参加了亚诺太太的慈善会，并开始研究产生社会灾难的根源。而克利斯朵夫根本不相信将来会有个公平合理的社会，认为将来仍然逃不出过去的一套。他不相信革命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但他寻访真正的群众，寻找相信生活的信念和艺术的魅力却是真实的。他关怀平民社会，他结交了一些平民领袖和工人群众，他说不清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要是有人强迫他选择，他一定会站在工团主义方面而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建立一个政府的任何主义。但当克利斯朵夫一接触工团组织，他那强烈的个人主义又使他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他们，他声明，被压迫的人固然值得同情，但当他们一旦去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奥里维固然同情劳动阶级，但他是崇拜自由的，而自由两个字是革命分子最不以为然的。现实逼着奥里维作出选择，他说他愿意和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奥里维同情一个鞋匠的孙子，名叫爱麦虞限。爱麦虞限和他祖父一样向往革命，但有人却说像他这样的驼子，在将来的社会里一生下来也得被淹死。他怀疑这种说法，痛苦极了。奥里维却借此机会向他灌输宗教思想，说灵魂不死，人死了一切都会得到解脱。在奥里维的影响下这个可怜的残废孩子也开始信仰起上帝来了。

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不是干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但由于他们同情工人，尤其是克利斯朵夫喜欢到平民中去，喜欢听他们的各式各样的议论。有一次他还写了一支革命歌曲，这支歌第二天就传遍了工人团体。警察局为此要逮捕他。奥里维也结交了几个工人，有一个是无党派的地毯匠，另一个是缅怀古老家族的邮差。

五一节近了，人们传说工人们将有大的行动。奥里维病了，在五一节那天，克利斯朵夫陪着奥里维到城里去散步。巴黎的工人正举行五一示威游行。克利斯朵夫兴高采烈地挤进群众队伍，奥里维见到驼子爱麦虞限从“瞭望台”上摔下来被警察追赶着，奔逃的群众踩在他的身上，他便不顾一切地奔过去救他。奥里维被势如潮涌的人群撞倒了。克利斯朵夫跟警察扭做一团，互相

打着嘴巴，他见警察的刀尖已对准他的胸部，他便迅速地把刀尖一转对准敌人的胸膛刺进去。这时只听得四处响起了枪声，许多窗户都挂起了红旗，树木被砍下来，一辆车仰天翻着，不到一小时，局势完全变了，游行变成了暴动，全区都成了战场。克利斯朵夫趴在障碍物上高声唱着他创作的革命歌曲，几十个声音在四周附和。

奥里维被人抬到酒店里，已经失去了知觉。克利斯朵夫这时还不知道奥里维的处境。一位犹太医生玛奴斯带信给他，说奥里维在瑞士等他，警察马上就要逮捕他了。当他得知奥里维已死的噩耗时几乎晕了过去。他来到边境，住在当医生的同乡哀列克·勃罗姆家里。医生的妻子阿娜细心地照顾他，可是克利斯朵夫竟和医生的妻子发生了不正当的行为，克利斯朵夫觉得欺骗了朋友，痛苦得想自杀，他决心离开医生的家。第二天他跑到山里隐居在白雪覆盖的小村子里，努力忘掉一切。

克利斯朵夫躲藏在瑞士山坳里的一个农民家里。昏睡的土地开始复苏了，初春悄悄地来临了，雪滴滴嗒嗒地融化了。洁白的草原上已经有些嫩绿的新芽从沉睡了一冬的土地里探出头来，光秃秃的林中，几只鸟唱出嘹亮的歌。但克利斯朵夫对这些都没留意，他心里想着死，事实上却是竭尽所能地求生存。克利斯朵夫就像莫扎特说的，“有一种人是始终要奋斗的，除非到了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在痛苦中想起了奥里维的孩子，他写信给赛西尔想把孩子领来抚养，可是赛西尔回信说孩子已被母亲领走了。克利斯朵夫迷迷糊糊，刮来一阵飙风，似乎有个活的上帝冲进他空虚的灵魂，终于找到了，他又信仰起上帝来了。于是“生命回来了，而心中的爱也苏醒了。”他感到过去自己有两种性格：“一个是创造的艺术，完全不问道德效果；一个是行动者，喜欢推理的。希望他的艺术有道德的与社会的作用。”现在这矛盾消除了。他认为艺术和太阳光一样，“太阳既非道德的，也非不道德的，它是生命，它战胜黑暗，艺术亦然如此。”

夏天将尽，一个巴黎朋友经过瑞士来拜访克利斯朵夫。他告诉他欧洲各地都在演奏他的作品，很受欢迎。但克利斯朵夫很不以为然，他已不把那些作品放在心上，他把最近作的曲子，拿给客人，可是客人完全不懂，以为他疯了。他的惟一的朋友奥里维死了以后，克利斯朵夫偏向于逃避现实了。

德国的案子，经葛拉齐亚帮忙已经撤销，他五一节在巴黎打死警察的事也逐渐被人遗忘。克利斯朵夫现在上哪儿去都可以了，他觉得住在瑞士挺舒服。

一天傍晚，克利斯朵夫在山上散步，忽然见到带着两个孩子来瑞士疗养的葛拉齐亚，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克利斯朵夫又重新燃起热情，想要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葛拉齐亚制止了他，只给他一种温存的友谊。葛拉齐亚很快就走了，他们约定秋末在罗马相会。克利斯朵夫到了罗马，见到葛拉齐亚，她外表丰满端庄，显得悠然自得，懒散。他很想同葛拉齐亚结婚，而葛拉齐亚拒绝了。她说：“幸福的婚姻实在太少了”，两人的性格又不同，担心以后会发生冲突。克利斯朵夫接到巴黎邀请他去几个音乐会当指挥的通知后就动身去巴黎了。

他到巴黎时心里非常悲怆，一切都变了：演员的角色换过了；当年的革命党变成了布尔乔亚，超人变成了时髦人物。表面上什么都没改变，但实际上什么都改变了，只有广场上集市仍旧同往日相同。巴黎人对克利斯朵夫的态度跟从前大不相同了，他们在文章里，口头上都说他的好话。当年曾经激

起他的义愤的人，现在他不再对他们严厉了。等到他忍不住要对这种人不留情地批一顿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你没有这种权利，你自以为是强者，可是做的事比这些人更要不得。克利斯朵夫在给葛拉齐亚的信上说：“你瞧，我老了，不会再咬人了，牙齿钝了。”经过十年的隐居生活，克利斯朵夫的确变了。他的演出受到了欢迎，连过去反对过他的敌手现在也捧他了。他在巴黎越住下去越感到有兴趣。但他也感到：他的运气不过是昙花一现。他的权威是靠着年代已久的名字，数量巨大的作品，热烈肯定的语气，不顾一切的真诚。他感到一般艺术家暗中对他抱着敌意，或者存着猜忌的心。青年们不了解他，不喜欢他。

他偶然在一个书摊上发现了爱麦虞限写的书，克利斯朵夫访问了这个靠刻苦自学成名的作家，谈话中，他感受到在年轻的作家身上反映出了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觉醒和英勇的理想主义的火焰。

随着年龄的老化，克利斯朵夫想回到家乡去终老，那边已经没有熟人，但家乡总是家乡，正当他延迟行期的时候，奥里维的孩子乔治来敲门了，他已长成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眉目清秀，瘦瘦身材的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他喜爱音乐，克利斯朵夫做了他的音乐老师。不久，葛拉齐亚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巴黎。她的十一岁的女儿奥洛拉也来向克利斯朵夫学习音乐，克利斯朵夫竭尽全力去培养这对少年。葛拉齐亚的儿子得病死了，这打击使她柔弱的身体来不及给任何人告别就离开了世界。克利斯朵夫悲痛欲绝，足有两三个月闭门不出。

克利斯朵夫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悲痛，踏着稳健的步子回到人生的旅途上。他创作的音乐，境界变得恬静了。当年的作品像春天的雷雨，在胸中积聚，爆发，消失。现在的作品像夏日的白云，积雪的山峰，满身闪光的大鹏缓缓地翱翔，把天空遮满了。

克利斯朵夫把他的爱全部给了奥里维的儿子和葛拉齐亚的女儿。乔治和奥洛拉在罗马举行了婚礼，克利斯朵夫亲自参加。但在婚礼举行之前，克利斯朵夫得了肺炎，他没让两个青年知道。

病重期间，克利斯朵夫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青年时期拚命地努力，顽强地奋斗，为的是要跟别人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为的是要在种族的妖魔手里保留自己的个性。友谊的快乐与考验，使他那颗孤独的心和全人类有了沟通。艺术的成功，是生命的高峰，在山顶上，劈面遇到了上帝，他跟他拚搏，筋疲力尽。于是明白了他的界限，努力完成上帝的意志。最后，克利斯朵夫在一生的追忆中，在皈依上帝的梦呓中死去了。故事就到此结束。

克利斯朵夫一生经历了反抗——失败——妥协的三个阶段。他在中青年，甚至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反抗。由于他采取的是个人反抗而不是阶级的反抗，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颓废艺术的盛行和音乐的商品化等等。克利斯朵夫个人反抗的失败，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内容的，它说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英雄无法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克利斯朵夫孤军奋战，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他却遭到来自敌对阵营的无数次攻击和诬蔑，对方用心的狠毒和手段的狡猾，有时使他忿不欲生，他在斗争中需要支持，但却不知道力量在何处，他始终游离于被压迫者的行列之外，他对工人阶级的看法，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弱点：一方面，他从罗赛一家的惨死，看到了社会的灾难，认为工人阶级中间存在一种原动力，它犹如“一股烈焰飞腾的热度和无数的电波，

传遍了整个社会；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看作是强者，把工人群众看作是好吃懒做的群氓，认为他们常常被资产阶级的政客所收买。诚然，在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时期，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是会有影响的，甚至会出现一些借工人运动以营私的政客。由于克利斯朵夫受表面现象的蒙蔽，未能认清工人运动的本质，对马克思主义存在误解，事实上当时马克思主义已存在半个多世纪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和法国早已传播开了，而克利斯朵夫却把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普鲁东甚至尼采混同起来。克利斯朵夫所处的时代是法国从巴黎公社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天比一天更为腐朽的时代，也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作者罗曼·罗兰早已感到“世界要窒息了，打开窗子吧！让新鲜的空气吹进来！”（见《贝多芬传》）克利斯朵夫是感到窒息了，但他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新鲜空气，他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他说“只有人使他感到兴趣，而不是主义。”

克利斯朵夫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使他不屈服于权贵势力，但他个人的英雄主义也使他远离人民。虽然他“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舅父等普通人的这方面，但起支配作用的是他的英雄主义观念，就是在他接近群众，参加工人的集会，为工人创作歌曲，甚至和奥里维一起卷入五一节工人游行示威的狂澜中，他还是不了解工人的需要，他依然自视清高，自命不凡，思想上并没有与工人群众相通。克利斯朵夫只信任自己的力量，坚持个人奋斗，不相信群众。作者在小说里谴责过那种投机钻营、庸俗卑劣的个人主义，但对克利斯朵夫只看重自己才能，一心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个人主义是赞许的，未加任何指责，正像作者肯定奥里维的理想主义而反对庸俗的理想主义一样。奥里维的理想主义是人类博爱友善的空想，它不是科学的理想。

克利斯朵夫所向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到了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一百多年之后的时代，这一切就只剩下骗人的空壳了。社会的出路在哪里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回答是不同的。无产阶级认为社会的种种矛盾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造成的，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才会发展，人民的生活才会改变，而克利斯朵夫却只希望对旧制度作某些变革而不是彻底推翻，他希望通过某些变革回到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的理想世界中去。

小说在指出主人公反抗性的同时又大肆宣传了博爱思想，作品中充满了克利斯朵夫关于爱的呓语。他认为人与人的区别不是阶级的不同，而是气质上的差别，他认为应变革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使人们忘记痛苦；用爱的行动把对立的阶级调和起来，让“信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好人携手”。他和奥里维还进行过爱的试验：让失去义父的孤女有了母爱；让失去女儿的母亲有了养女，让驼背童工爱麦虞限由于幻想中的爱而忘却自己眼前的痛苦。这一切都是作家的阶级局限性造成的。

罗曼·罗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当作英雄人物来推崇，事实上，他并不是英雄。晚年的克利斯朵夫完全成了爱憎不分的庸人，最后他只得投入上帝的怀抱去寻求精神的解脱。

克利斯朵夫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对资产阶级艺术的批判和否定，虽然是在个人圈子里进行的，范围比较狭小，但却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克利斯朵夫的战斗精神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它仍不失为一支掷向旧世界的投

枪，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来说也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就是在今天，它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它的反抗方式和社会理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与历史潮流相悖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创作生涯中早期的作品，他自己对主人公的思想都曾作过分析批判。他说：“无论是我，无论是我同时代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有文化的代表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都丝毫没有一点概念。”罗兰曾经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克利斯朵夫式的“优秀分子”身上。克利斯朵夫的悲剧也就是作家本身的悲剧，它促使作家重新寻找生活的答案，终于喊出“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面向前吧！”是的，只有越过他们，社会才能向前。

《母与子》

《母与子》这部长篇小说主要叙述女主人公安乃德和儿子玛克母子两人曲折复杂的一生经历。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

安乃德是法国巴黎有名的建筑师拉乌尔·李维埃的女儿。她长得虽不标致，却很结实匀称，她继承了父亲端正的五官和迷人的微笑，她有一头棕褐色的厚发，总是披散在她那晒成金黄色的脖子上。她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就已经失去了双亲。她那感情深沉、仪态安详的母亲早已去世，父亲在不满五十岁时，被突发的尿毒症夺去了生命。安乃德失去父亲有半年之久了，她成了巨大遗产的惟一继承人。有一次，她在父亲的信堆里发现了隐秘，她一向尊崇的父亲却是一个生活放荡的男人。他有外室，女的是卖鲜花的，还生了一个女儿名叫西尔薇，是一个做帽子的女工，西尔薇的生母已经去世，安乃德决定去寻找西尔薇。

在曼纳大街一座楼房的七层楼上，她终于找到了西尔薇。西尔薇和她差不多一般高大，可是腰身苗条，按照身体的比例，脑袋显得小了一点，上身很丰满，她的额头和下巴是圆圆的，鼻子不大，有点向上翘，浅褐色的头发，说话的时候上唇微翘。她们两人都在对方的身上认出了父亲，一刹那的敌意之后她们热烈相爱了。

不久，安乃德与邻人洛瑞·勃里索相爱，勃里索一表人才，口才很好，是大学里的同学，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是个得宠的儿子，安乃德倾心于他。她与洛瑞订婚了，婚礼定在仲夏举行。安乃德是一个酷爱自由和性格独立不羁的人，她为将要失去的自由感到很不自在，她不愿从属于别人。可是当她被洛瑞的父母邀请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她被一阵狂乱的热情支配着竟失身于洛瑞了。她发现洛瑞不是她的理想伴侣，他并不爱她。第二天，她回到自己的家。可是不久她发现她已经不是独自一人，一个新的生命在她体内成长起来。

一九〇一年夏天，世界博览会使巴黎热闹起来。这时安乃德来到山区湖畔隐居，第二年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小玛克。安乃德带着她心爱的儿子回到巴黎，由于这孩子是安乃德没经过结婚手续生下的，不为社会所承认，人们都对她侧目而视，她的亲友拒绝接待她。安乃德只得深居简出，一心抚养她的爱子。

正当安乃德遭到周围人们的摒弃的时候，替安乃德掌管财产的公证人格勒吕席卷她父亲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包括股票、现款和房地产逃跑了，而安乃德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消息，直到债权人和军警来查封她的财产时她才大吃一惊，但已无法挽回了。安乃德破产了。破产后的安乃德带着孩子搬到西尔薇住的公寓五楼上居住。安乃德在学生时代成绩优秀，她的数理课程学得很好，凭她的知识水平，找工作没问题，但虚伪的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她没结婚而有了孩子这一件事不肯接纳她，她找不到工作。最后她只得担任家庭教师，收入十分微薄，而且这种职业又没有生活保证。那时的巴黎还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地下铁道，她每天要走很远的路，一到晚上两只脚说不出的疼痛。这种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她感到一种满足，是一种对自食其力的生活的满足。安乃德为了工作方便将玛克放在他姨母西尔薇的裁缝作坊里。艰苦的生活教育和锻炼了安乃德，她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但她没有向困难低头，倔强地生活着。

安乃德的异母妹妹西尔薇比她小两岁，二十六岁时嫁给了一个手艺高强的裁缝。从那时起她对安乃德产生了莫名的嫉妒，两姐妹的感情逐渐淡漠了。安乃德只好从妹妹家里搬了出来。

安乃德秉性非常耿直，待人诚恳，绝不作对不起别人的事。有几个男性向她表示过爱情，她都拒绝了。她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抚养着自己的孩子。

玛克上了中学，这个十三岁的少年和同学们的关系很不融洽。他对于他的身世和母亲的历史，常常表现出忧心忡忡的窘态。他深信自己是私生子，所以总是形单影只，落落寡合，他生怕别人猜出他的秘密。他痛苦地感觉到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既无力量，无才华，又不俊秀，生活使他产生了自卑感。他在自己真正的不幸之外，又加上一些想象的不幸。比方两个年轻女工从他身边走过，谈笑着，他就认为她们在笑他。他变得多疑懒散，不用功，好游荡，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甚至更深半夜跳墙出去游逛。玛克被学校开除了。

被学校开除后，玛克想独自谋生，没有如愿，险些流落街头成了乞丐，他只得回家了。他和母亲在感情上有较大的隔阂，他从不和母亲谈心，他不知道怎样做人，也不知道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他读了不少知名作家的著作，但都找不到答案。有一次，罗曼·罗兰路过巴黎，住在拉了区的普通旅馆里，玛克去拜访他，他们谈了很久。罗曼·罗兰告诉玛克，要他“忠实于自己的本性”，玛克得到朋友的帮助受到启发决定走一条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随着岁月流逝，玛克渐渐地懂得了母亲心里的秘密，认识到母亲的高尚品格：她宁愿一辈子过着艰苦的生活，自食其力，也绝不肯委屈求全，取悦他人过富裕的日子。玛克由对母亲的不满、轻蔑到信任、尊崇母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到处都是面带忧愁的人们。每个家庭都受到战争的威胁，安乃德和她的儿子玛克成为这次战争的激烈反对者，安乃德甚至甘冒危险，暗中帮助一名被俘的交战国青年士兵偷越国境，逃到中立国瑞士去。帝国主义战争更加深母子俩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嫌恶，他们二人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无知的，以为苏联的革命是违反人道的，是暴力，他们反对战争，惧怕暴力。他们母子两人都是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忠诚支持者，在革命的风暴面前他们感到软弱无力。

玛克爱上了斯拉夫族少女阿西娅。阿西娅原是沙俄时代一个俄国教授的女儿，她十七八岁，家里人死的死，散的散，她独自一人流落在巴黎，在穷

人区的一个小旅店她认识了玛克。他们由恋爱到结婚，两人沉醉在爱情的甜蜜之中。母亲警告他们不要把火焰一下燃完了，节省一点热情。不久，火焰真的开始熄灭了，天空变得阴暗，彼此都感到空虚，他们都强调自己的灵魂是属于个人的，个人主义在他们之间形成一堵高墙。玛克的母亲安乃德一生也是坚持这种信念的，玛克受到母亲的影响。他觉得什么主义都与他无关，他认为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唯心主义，共产主义这些争论与自己无关，这些都是束缚人的项圈。

阿西娅有了孩子，她认为孩子出世等于把一条锁链牢牢地钉在他们身上了。阿西娅苦恼极了，她想：“我将为他而牺牲我的自由吗？不！这是太苛的要求了！”但自由是什么呢？怎样去获得自由呢？这一切对她来说还是个不解的谜。阿西娅不愿意停留在口头上的自由，她要行动，要冲出去。但玛克却缺乏行动的勇气。玛克认为，你一个人单独行动是干不了什么的，你的脑壳会碰得稀烂，你必须和其他反叛者联合起来，但是要联合就要受约束，就得接受那些党派的纪律与主义，玛克拒绝了。两个人的思想产生了矛盾，阿西娅是爱玛克的，但光有爱情是不够的。由于思想上的分歧他们都感到痛苦。阿西娅到苏联驻巴黎的商业代表团去做打字员工作。她在这里进一步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玛克阻止她去做这项工作。阿西娅回答他说：“不，我是自由的。”在苏联代表团，她被一个叫狄多的秘密工作人员注视着，狄多看出阿西娅愿意跟苏联人在一起，并劝她把丈夫玛克也带到苏联方面来。狄多还向她指出，“你个人的历史是不能和我们所写的历史相比的。”阿西娅受狄多影响，晚上她和玛克谈到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两人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当玛克发现阿西娅同狄多接近的事，非常生气，就在他们口角之后，阿西娅失身于狄多，由此而引起家庭的分裂，阿西娅独自搬到旅馆去住了。安乃德完全理解儿子和儿媳的矛盾，她承担了孙子的抚育责任。阿西娅对自己同狄多发生的不正当关系也很厌恶，她离开了苏联商业代表团，随一个产业团体，去挪威当了记者。

玛克心灵的创伤很深，很痛苦。他憎恶那些为帝国主义而虐杀人类文明的暴徒，他想拿起莫斯科的棍棒来摧毁那些暴徒，但又想到莫斯科是不会要他的。他想要避开莫斯科的道路，可是他又发觉他被一切党派冷落了。他写的文章，人家都不愿用。他自己印了一本书，六个月了，一本也没卖出。

他愤恨极了，他在那无窗无门，同人民的生活隔绝了的个人主义的死胡同里喘息着。这死胡同是他曾经企图把阿西娅和他自己一起囚禁在里面的鬼地方。他突然感到阿西娅要从里面跳出来的行为是对的。

正当玛克的内在意识要崩溃的时候，他受到了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的刺激。一个曾经追恋过玛克而后来嫁给一个资本家的女人用狡诈的手段污辱了他的人格，他在痛苦中思念阿西娅。而阿西娅也正好这时回来了。

阿西娅到欧洲几个国家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但一无所获。她在德国亲眼见到法西斯势力正在日益抬头，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她想去苏联，但她想到在敌人营垒里工作，对她更为合适。她想念分离了许久的玛克，于是阿西娅回到了巴黎。

阿西娅到了巴黎，先去看望安乃德和她的孩子。玛克知道阿西娅回来了，他也很想见到她。有一次，在安乃德的楼梯上，他们相遇了，开始是各走各的路，蓦地两人各自回头看，然后发疯似地向对方跑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分离的家庭重又团聚了，经过思想上的搏斗，爱情有了新的基础。玛克

心灵的创伤愈合了，爱情的复苏使他解除了精神上的自私和绝对相信自己的信念，但是距离个人思想的彻底解放，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他开始认识到所谓的精神自由，非暴力主义，全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玛克要舍去它们，根除它们。好几个不眠的夜晚，他想从个人自由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去为革命群众的共同行动承担任务，但他还不清楚他应做什么，他只想到彻底铲除这个观念。在暴力问题上，他还有些踌躇。今天在欧洲要行动，就不能没有暴力，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以暴力在统治。怎么能把这个情况改变过来，重要的是拿出实际行动。

玛克行动起来了，他和几个法国青年成立了一个拥护苏联的组织。他开办了一家书店，出版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由阿西娅翻译这些书。但书籍被查封，发不出去。工作是比较危险的。后来，玛克找到进步的读者群众，工作才逐渐开展起来。

安乃德的热情也受到鼓舞。她过去的同学裘里安·大卫，由于思想有点僵化，安乃德从他的情网中逃脱出来。大战中间，由于他维护科学的尊严，不赞助战争狂人的行动而受到迫害，这使他清醒过来，他接受了安乃德过去曾经有过的思想，战争结束后他成了有名望的进步人士。他的妻子死后，留下了一个生命力旺盛，浑身充满激情的女儿，她叫乔治蒂，这个高大、强壮的少女发现了父亲心里的秘密，是她找到了安乃德。安乃德和裘里安·大卫恢复了友谊。

与此同时，安乃德见到了七年前她在南意大利旅行时，救她脱险的意大利伯爵勃鲁诺·萨伦查。由于突发的地震，他失去了幸福的家庭，财产和亲人。此后这个伯爵以读书和旅行度日，他到印度和西藏住了几年，一九一四年六月，他离开了喜马拉雅山，结束了隐居生活，来到欧洲，尽力阻止人们互相屠杀。他到军医处组织救护队，尽心尽力地为伤员们服务。在阿尔巴尼亚，在马其顿，他陪同那些害伤寒病和疟疾的军人撤退，他在战争中得过医学大勋章和战争十字勋章。战争结束之后，他尽力做好善后工作，他发誓要将那些苦难中的“人之子”救出墓穴。勃鲁诺用他那美好、明朗、宁静的眼睛巡视各处，抚慰人们的肉体 and 心灵上的伤痕，他以医生、使徒和劳动者的身分，到处留下他发光的足迹。他出版了许多书，许多外国学院，包括巴黎学院都选他做通讯会员。裘里安·大卫是最先发现勃鲁诺伯爵的见解新奇而又胸怀远大的一个人。他们开始互相通信，逐渐成了朋友。

勃鲁诺伯爵，他本不想干预政治，他为一切受苦的人工作，但法西斯分子却企图干涉他的工作。他亲眼见到一群无赖在大街上侮辱、践踏得过奖章、受过尊敬的荣誉团战士，他干预政治了，他出庭为他辩护作证。他的义正词严的行动，使他受到黑衫党的迫害。他从意大利监狱逃脱出来以后，爬过阿尔卑斯山，来到巴黎。居住在巴黎的意大利难民欢迎他。勃鲁诺伯爵的徒步逃亡记，成了欧洲报纸三个星期的珍闻。

勃鲁诺伯爵接受了裘里安·大卫的邀请，搬到大卫家里同住。十八岁的乔治蒂被勃鲁诺的精神所吸引，当她从勃鲁诺的口中听到安乃德的名字时，她说出了她的地址。这是她早已从她父亲的私人信件中得知的隐秘。在她的中介作用下，他们一起到安乃德家里见到了安乃德。乔治蒂喜欢安乃德，她早晨来，晚上来，天天都带一大把鲜花送给安乃德。乔治蒂喜欢阿西娅的儿子，她带他玩，给他洗，给他吃。这少女温暖的、忠实的、无声的呼唤使安乃德很感动。裘里安·大卫是爱安乃德的，但他的沉默、骄矜、自卑的性格

使他又无力表露最深的感情，爱得愈深，感动愈大，表露出来的就愈少。在安乃德见到裘里安·大卫之后，他们的僵局打开了，两个老朋友经常会面。裘里安已经认识了玛克、阿西娅和他们的儿子凡尼亚，并且在这个家庭中还占了一个席位。但安乃德心中却还有勃鲁诺伯爵的位置。安乃德的心灵被两个老朋友分占着，勃鲁诺给她多些，但她给裘里安多些。对于她这种女性，给予的需要比接受的需要更强烈。以安乃德一生的遭遇来说，是会期望得到一个沉默、坚强的伴侣来照料她的。然而她怎能抵挡住另一个无声的呼唤呢！他是她孩提时代的朋友，他为求得摆脱凡世镣铐的束缚曾经英勇地斗争过。他那么骄矜，那么自卑，他不肯企求那惟一能给予他希望与欢乐的人的帮助。他总是无言而忧郁地站在她旁边。这两个亲密的朋友年纪都已超过恋爱的年龄，可友谊这字眼又太轻，感情超越了友谊，但安乃德不愿跨过它。她已经做了母亲，做了祖母，她属于她的家庭。

勃鲁诺和裘里安是从旧精神束缚中挣脱出来的学者，他们憎恨旧有的一切，他们清楚历史发展的趋势，但他们不肯行动。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压力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暴乱，但他们并不去加速或阻挡它的到来。他们看到流血，但又不愿把他们美丽的手指插入血污里。玛克和他们不同，他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几年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凡是所谓抽象的永恒真理，能适用于一切事物的，往往什么也不适用。”“认识不能没有行动。不是明天，不是一切时候，而是此时此地在我的脚下踏实的土地上，才能找出确切的健康观点。”玛克认识到，“今天只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劳动的目的。一切其他东西——信仰与文化，纯粹的理性，社会的优势——一切只有重新开始建立在有组织的劳动的坚强基础之上。但是在酷烈战斗之中，这种组织要求赫丘利斯般的强大力量。个人不是赫丘利斯，差得远呢！但是我们要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们要献出我们的一切，我的生命，……如果是必要的，我的死亡，我全部信仰的力量。只要世界上有一个像我们的人——不必多，努力去做，这细胞会使无组织的广大群众自己凝结起来，而我们将变成一座活动的大山。”

玛克下决心为这个目的而奋斗，他开始进行组织劳动群众的工作，以迎接行将到来的社会斗争。当然这是最困难的工作。玛克勇猛地斗争着，由于有裘里安和勃鲁诺的支持，民众听他讲演，在新闻界已有了名声。就在三月十八日那天，玛克和阿西娅参加了“赤色国际服务社”一年一度的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晚上，安乃德和勃鲁诺留在家里，裘里安·大卫和阿西娅同玛克在讲演台上，大会尚未开始，但已觉出风暴就要来临。阿西娅看到一些充满敌意的目光向她盯视，裘里安的讲演遭到辱骂，玛克刚一张开嘴，双倍的叫嚷企图制止他的讲话，玛克失去了自制力，也开口辱骂，敌人发狂了，他们站起来挥舞拳头，突然像洪流一般你推我拥地跳起来袭击讲台。这些人是“法西斯行动派”的青年绅士。阿西娅站在玛克面前，有五六个最凶恶的人跳上了讲台，其中一个长得像玛克一样的瘦，举起手杖对准阿西娅的面孔打了下去，幸亏玛克像野猫般及时跳过桌子，扑上去掐住刺客的咽喉，但手杖尾已将阿西娅的面颊划了一道伤痕。那个用手杖打人的青年在玛克的致命打击下已失去了知觉。忽然电灯熄了，会场变得漆黑，这时响起了两三声枪声，玛克被阿西娅拖出会场，朋友们把他推进一辆街车开走了。

赫丘利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神勇无敌，力大无穷，屡遭天后赫拉迫害，但都转危为安，建立了十二项大功，为民除害。

玛克回到家里，他想到了暴力，他默默地祈祷，但愿在将来的战斗里牺牲自己，保存别人的生命，以减轻人类的苦难，保卫被压迫的人们。

事情发生之后，玛克总是心神不安，并不是因为他考虑到法律的后果，因为先动手的是死者，他是出于自卫被迫采取行动的。然而他的内心控诉自己，他厌恶自己，厌恶自己所有的行为，他失掉一切工作兴趣。安乃德和阿西娅都主张让玛克离开巴黎几个星期，以医治他此时的烦恼。事情也很凑巧，玛克收到一笔稿费，于是决定离开巴黎到国外旅行三个月。

玛克的一个朋友在他临行前忠告他说，不止巴黎有人仇恨玛克，别的地方也会有，一切要小心谨慎，债主们有国际联系。

他们离开了巴黎，丢开了所有的烦恼，感到多么自由、轻松、快乐！他们爬山，采集野花。幸福的日子流逝着，母亲和儿子的互相了解增加了。妻子和丈夫都感到一种生命的和谐。

安乃德在山林里散步，偶然地救出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使她脱了险，孩子的父母万分感激安乃德，他们邀安乃德一家到他们家做客。女孩的父亲名叫雷翁奈·查拉，是威尼斯大银行的经理，原籍是南斯拉夫犹太人；母亲是美国犹太人，也是金融界的人物；战争期间他们的大部分可动资本和客户的存款，都在替法西斯的利益服务。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喜欢艺术和文学，对各类人物也喜欢作心理分析。他们感激安乃德从死亡中救活了他们的女儿，邀请他们游览意大利，并请他们住到他们在罗马的宅子里。安乃德和她的儿子、媳妇没接受这些好意，因为他们说只打算旅行到瑞士为止。

他们乘班车来到瑞士的卢根诺。裘里安为一个亡命者的案件作证，也来到这里，他们又相会了。黑衫党徒注意了他们。玛克同那在法庭上大受瞩目的裘里安的密切往来，不久使黑衫党对玛克也注意起来。裘里安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荣誉主席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敌人虽然已经监视他们了，但玛克不以为然，可阿西娅却十分警惕，她偷偷将别人交给玛克捎带的一封信拆看了，并换走了信纸。下午五点钟，三个面颊肥胖的警察官包围了玛克和阿西娅的住处，并搜查了他们的屋子，由于信被阿西娅换掉了，他们没有得逞。又由于安乃德表示同大银行董事长查拉是朋友，警官们吓得面面相觑，告罪走了。

安乃德一行三人也离开了这阴霾的地方，到米兰访问了几个朋友。他们发现朋友们都很谨慎，玛克感到很烦恼。他想，这神与英雄的土地，绝不会是元首（指墨索里尼）命令报纸写的那个样子，也绝不会是依照元首的剧本而画成的舞台布景那种样子。玛克深信暴君的压迫定会在它上面撞碎。“我相信意大利必定再次站起。我相信真理，相信生命。”

欢乐又回到他们当中，他们继续踏上旅行的征途，当他们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斯海岸走上围着高墙、高耸着巍峨宫殿的宽阔的石板街道上，看见凌霄的尖塔上的尖剑时，由于缅怀古代文明，他们愉快地住了下来，准备第二天再去罗马。

第二天中午，三个人来到老桥，安乃德和阿西娅走进店里买些纪念品。玛克发现一些黑衫党徒站在桥口，有几个正在审视他。安乃德和阿西娅买好东西之后同玛克走向桥口，阿西娅突然发现一辆汽车载着一个似曾相识的人飞快地驶过去。正当她回头时，拐弯处出现一个胡子灰白，稍稍伛偻，戴着近视眼镜的老人，他的前面走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突然一声口哨，一大堆人吆喝着扑上他们，孩子被掷到十步之外，老人被围在中央，拳头像雨点

般地对他打主。老人的眼镜被打碎了，他大声呼叫起来，孩子不顾死活抢上前去救他父亲，结果被法西斯党徒揪住脖子，向桥栏外掷去，桥外面就是深不见底的河水。

这个野蛮的场面使所有胆小的行人都惶恐地跑走了。一个高级军官坐在汽车里加速马力开了过去。玛克憎恶这些胆小鬼，他跳上前去救起半身悬在桥栏外的孩子，一个大个子法西斯党徒把刀子插进了玛克的身体，阿西娅见此情景疯狂地冲上前去，将十个指头挖进屠夫的丑脸里。警察来了，匪徒们四散逃走了。玛克仰面躺在地上，双手抱住他受伤的心房，血从他的指缝里汨汨地流出来，他死了。

安乃德站在十五步外，全身麻木，呼吸急促，她以超人的力量走向儿子的尸体，用双手推开媳妇，抱起死了的儿子把他放在膝上，紧紧地搂住他。刹那间，全部的生命同悲哀一起流回来了，像冰河在融解。母亲呼唤着儿子“回来呵，回来呵！不要走呵，我的孩子！”悲伤的呼唤突然停止，安乃德和阿西娅一同抬起尸体，回到旅馆，她们不愿意在这杀人的石城里多留一天。第二天晚上十一点钟她们乘火车走了。开车前，被救的那个孩子流着泪，目送他们逐渐远去。

安乃德化悲痛为力量，她把玛克尸体运回德国安葬之后，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参加拥护和声援苏联的集会，她勇敢地登台发表演说，她那深沉的语言有力地打动了听众的心。有一次，她在整理儿子遗物时，发现玛克保存了罗曼·罗兰写给他的信，安乃德专程到瑞士莱芒湖畔的奥尔迦别墅拜访了罗曼·罗兰，并把罗兰写给玛克的信如数送回。安乃德和罗曼·罗兰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由于玛克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罗兰表示深切的敬意，但同时感到玛克所选择的道路是罗兰给予他的影响所致，玛克为此牺牲，罗兰又感到歉意。安乃德说，就是她也会给玛克以这样的教导，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除非是懦夫，谁也不应该害怕危险的生活。

玛克遇难之后，很长时间阿西娅整个的心都被悲痛充塞着，过度的哀痛使她失去了对客观事物的知觉，安乃德再三劝慰她。阿西娅逐渐恢复知觉之后，决心为玛克报仇。她急于回到革命阵营，立志完成玛克未竟之事，玛克没有能够做到的事，她一定要做到。阿西娅在安乃德的劝慰下，嫁给了一个美国工程师。她把孩子留给安乃德，同丈夫到美国去了。阿西娅到美国之后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她支援被迫害的美国共产党，参加揭发和控诉美国反动统治者迫害劳动者和革命者的正义斗争，支援印第安人反压迫的斗争，参加反帝联盟支援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她的进步活动引起美国警察和特务的盯梢，三K党甚至想将阿西娅像烧死黑奴那样烧死。

阿西娅不为反动势力所屈服，她的活动范围日渐扩大，她的足迹不仅在美国和美洲的其他地区，有人还在中国的上海见到她，有人还见她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

年近六旬的安乃德，身体衰弱多病，她住在巴黎近郊一所小别墅里。有一天罗曼·罗兰还亲自到这里来探望安乃德，两人谈话十分投机。罗曼·罗兰临走时还请安乃德将她的拖鞋送给他，以作永久的纪念。她临死之前精神上达到了她所追求的和谐，感到宇宙间一切对立因素，到最后都归于协调，整个宇宙充满和谐。安乃德的灵魂向和谐之路冉冉上升，安乃德的生命结束了，故事也到此收尾了。

《母与子》这部长篇小说直译为《被魅惑的灵魂》或《欣悦的灵魂》，

我国翻译家采取了《母与子》的书名，这是意译，它原是本书第二部分三四卷的总标题。

从全部故事情节看，安乃德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前半部的重要主人公，后半部的重要主人公已转移到儿子玛克身上了，作者着重写他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

安乃德是作者笔下的叛逆女性，年轻的安乃德对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伦理道德和家庭生活都不满，她反对男性对女性的不公平，大胆承受了社会舆论的压力，靠自己的艰辛劳动，自食其力，抚养自己的非婚儿子长大成人，前半部可说是个人争取自身独立、自由的主体。后半部随着玛克的成长，通过玛克同阿西娅的生活和斗争，作者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出发，表现了同情人民，支持苏联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民族沙文主义的进步主题。从前后两部分的内容看，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发展了，深化了，扩大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法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进步人们，他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所作的英勇斗争。人民为了制止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为了寻求自身精神解脱的正确道路，他们历尽艰辛，不顾打击迫害；不怕流血牺牲，大胆地揭露战争贩子们的险恶用心和罪恶行径。这部小说的思想倾向是积极进步的，作者站在进步人民的立场上，生动地描写了进步知识分子为寻求社会的正确出路而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历程，真实地写出了他们的爱与憎，痛苦与欢悦，反映了历史的前进性、曲折性。但由于作者的社会理想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反映在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罗曼·罗兰在一九三四年为本书写的《导言》中说，他在这本小说里写的是“一个漫长而诚挚的生命的内心历史，这个生命富于悲欢乐，不缺少矛盾，错误也多，她不停地努力，企图达到的不是那个不可能达到的真理，而是精神的和谐，因为精神的和谐是我们最高的真理。”罗曼·罗兰还说到他的女主人公是一个被爱的热情所迷恋的灵魂，她那被魅惑的幻觉之衣一层层被剥掉，直到最后归于精神的和谐，就像生命之泉在流淌中遇到障碍物激起波涛和浪花而后归入大海一样。作者有意在书的最后安排了一章“神圣的道路”，描写主人公安乃德即将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刹那，意识到人世间一切矛盾皆归于和谐，于是她的灵魂和宇宙万物的最高和谐境界融汇成一体。罗曼·罗兰采用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手法，让主人公在精神和谐的梦幻中倒下，这种所谓哲理性的结尾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阶级调和的色彩。罗曼·罗兰的抽象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无论在他的英雄传记，或者小说《哥拉·布勒尼翁》、《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这部《母与子》中，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母与子》在艺术上具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同样的清新自然的抒情魅力，也具有戏剧性的波澜曲折和紧张的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